

邹至庄解说中国经济

邹至庄○著

全面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科学预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邹至庄解说中国经济

作者:[美]邹至庄

ISBN:978750866950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

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堪比美国。中国有很多穷人，但是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条件与生活水平可以与美国最富有的人媲美。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不比美国的差。如果把上海与纽约相比，不但上海富有的人民不输纽约的人民，而且上海的建筑也比纽约的新和漂亮。上海看上去比纽约还要繁华。不少游客喜欢去上海旅游。

繁荣的中国是本书的背景。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在十年内便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随后的文章评析中国经济，包括经济解释、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分别载于书中的第一、第二与第三篇。从目录可见本书内容很广，且评论涉及诸多经济领域。这50多篇文章是我在不同时间结合当时的感触与兴趣写作完成的。有些是受到当时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与当时的经济问题有关。

书中的文章之前曾刊登在上海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台湾地区出版的《工商时报》和香港地区出版的《邹至庄灼见名家》。刊发日期从2014年3月到2016年4月。除个别文章是最近发表的以外，其他的文章都是根据出版先后排序。每篇前一半的文章大概是在2015年4月前发表。

我从1955年开始讲授与研究经济学至今凡61年。1980年以后常回中国讲学、做研究、与朋友交流。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教育委员会（后改为教育部）合作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时任总理顾问。本书将我研究中国经济与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部分心得，与读者分享，并请大家指正。

每篇文稿经邹陈国瑞女士阅读与修正，特此致谢。

邹至庄

2016年4月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第一篇 经济解释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

在十年内中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一点，正在变得日益明显。我先说明中国经济地位提高的理由，再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后应尽的职责，以及现在可做的准备。

如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衡量它在世界的地位，那么在十年内中国将有可能居世界首位。今天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计算和美国大致相当。这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结果测算的。前者的估计指出，中国的GDP稍高一点，后者认为美国的稍高一点。其实可以说二者大致相当。假定中国的实际GDP增速每年只有6.0%。自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实际GDP的增速从2010年到2015年六年的平均增速是2.068%。我又请教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专家，他的答案也是2%。假定今后十年美国GDP的平均增速高达2.5%，那么结论是十年以后中美GDP的比例是（1.060/1.025）^{10}，亦即1.38，或者说中国的GDP将比美国高38%。届时中国将会变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上面对两国GDP增速的假定只是按照平均增长率，其间两国GDP增速的波动是难免的。

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后，中国能担当起这个重要的职责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请看世界数百年来的历史：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相继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成为世界的领导。当然，成为开明的还是强暴的领导，每个强国的情形不同。每个国家的行为都包括好与坏两方面，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根据历史经验，十年后中国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必能领导世界上很多的经济活动。当然，这一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是否会被其他国家认可，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中国占据世界经济领导地位以后，因为环境的需要，政府与民众中必会产生一些杰出人才来参与领导世界经济的工作。政治与社会环境将会决定中国如何担当世界经济的领导。成为领导之后，是只顾本国的利益，还是同时兼顾他国利益，我们可以根据近年来中国施行的对外政策来回答。不但中国从对外投资中获利，接受投资的非洲与南美洲国家也受益良多。正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在中国投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现在中国倡议“一带一路”，中国的投资影响亚洲、中东以至非洲的国家，也是双赢的。因为对外投资是互利的，所以中国在领导世界经济时，对外投资就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当英国和美国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时候，它们的对外投资也同样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有所贡献。

大多数中国人民或许还没有留意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后，中国人民会从此得到更多更好的个

人发展机会。记得当英国或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它们的人民有很多机会致富，而且不论在本国还是在受本国影响的国家生活都能得到方便。当机会到来，中国人民自然会利用它。本文的目的是提醒中国人民，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中国人能够在一个比现在更广阔的市场中活动。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比现在更多，因此现在应当作适当的准备。利用中国强大后得到的机会，我们需要积累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可以从创建企业获得，人力资源可以从教育获得。当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提高后，中国人开办的企业和他们所受的教育必会得到较高的报酬。因此，中国人民现在应当尽量投资，人力资源的投资不但包括个人的，也包括社会的。中国的社会秩序应当改善。中国人到外国工作或旅游时应当能够是文明国家的居民。

站在政府的立场，也应当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扩大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政府可以鼓励银行和金融市场给民营企业提供资本，使其快速发展。政府可以利用各种政策资助、鼓励青年人多受教育。等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提高以后，这种投资便会得到很高的回报。

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是从历史积累而来的。人力资源比物质资源更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物质资源被战争破坏，但是它们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不久便重建了物质资源。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充足的文化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但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今后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原因。

中国面临经济问题的对策

今天中国面临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如GDP增速降低。本文的目的，第一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第二是指出GDP短期波动的原因和对策，并分析这种短期波动与长期发展的不同。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波动常会发生。波动的原因是需求的变化，这可以从总需求和个别产品的需求来讨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是因为总需求不足。总需求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美国的总生产多于总需求，因为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不足，消费者与投资者对日后的收入和盈利持悲观态度，以致减少消费和投资的数量。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应该增加支出来填补总需求的不足。中国在2008年也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促进GDP的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包括进出口的下降和个别产品的需求减少。因为外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中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便会减少。因为中国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中国进口产品的数量便会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16年2月，中国的出口额只有1261.5亿美元，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25.4%。2016年1月，中国的进口额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11.2%。关于个别产品的需求减少，现在中国的钢铁业与煤矿业是明显的例子，钢铁与煤炭行业的部分工人面临失业问题。

政府可以用适当的政策来解决上述这些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政府的总支出，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的总需求。第二是利用微观经济政策，利用政府的财政资源来帮助生产过剩企业的员工转移到别的企业，帮助一些由于市场需求改变而应当增加生产的企业来扩充生产规模。后者是通过改变经济生产的结构来适应市场的需求。

当钢铁企业与煤矿企业关闭或减少生产时，政府应当帮助失业员工，给他们有限时间的失业补助。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时，政府把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同时允许它们裁员，但是下岗工人会得到失业补助。

政府财政资源从哪里来呢？最简单和最适当的答案是动用一部分外汇储备。2016年1月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约有3.2万亿美元。按照1美元换6.48元人民币算，折合人民币20.7万亿元，约等于中国2015年GDP的30.6%。外汇储备的10%已等于GDP的3%，利用这些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是最适当的。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办法，除了上面说的增加政府支出，或称财政政策以外，还可以采用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

供应，降低利率来刺激生产。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正在采用的政策。

研究宏观经济波动有两方面：第一是短期波动。这在上面已经讨论了。第二是长期增长。长期增长的因素和波动的因素不同。GDP的长期增长有赖于生产能力的增加而不是总需求的增加。如果生产能力有限，增加总需求不能增加GDP。我前一篇文章题为“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讨论了中国GDP的长期增长，结论是十年后中国的GDP会比美国高约38%。长期增速，有赖于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的基本动力，有赖于中国的人力资源，包括勤劳和高质量的劳动力、精明和有眼光的企业家以及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继续发展的动力。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GDP增速会变慢一些。提高GDP长期增速的办法与提高短期增速不同，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来建立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根据本文关于市场经济短期波动的讨论，我们不应当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发生的短期不景气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

美国媒体对中国银行风险的报道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根据美国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国银行的大量贷款也是有风险的，甚至说中国可能面临同样的金融危机。本文先阐释美国的报道，再说明我的观点。

2014年3月1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头版刊登了李克强总理的照片，同时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银行坏账引起对经济增长的担忧”的文章报道了总理的讲话。文章指出因为政府继续开放金融市场，今后不能偿还的多种债务难以避免。同时指出政府将会设法保证坏账不致扰乱金融市场。总理决定改变过去的作风，让少数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承担自己的坏账。在回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总理指出政府应加强监管以避免金融市场风险。我看了头版的照片和文章标题，以为中国金融市场确实存在问题。看清楚内容后，才知道这都是记者的怀疑。

后来我想看看有关中国金融风险的其他报道，便从谷歌搜索“China financial crisis”，看到很多报道都是说中国的坏账会导致金融危机。下面举了几个例子。

1.中国经济可能发生了大问题，因为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是在国外债务市场不能偿债的第一家中国企业。只有一家企业不能还债，能说明整个经济可能发生大问题吗？

2.中国企业的坏账总额已达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最高值。但2008年的坏账比现在还高，现在的坏账没有当时严重。

3.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报道，在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的银行坏账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总数达到5921亿元人民币，为2008年以来最高。坏账总数占债务总额从0.97%增至1%。这种比例的坏账额度能算高吗？

4.2014年四大国有银行的总市值下降了700亿美元。四大银行总市值是7141亿美元。因为美国股价上升，中国工商银行的总市值已从2013年全世界最高的2336亿美元，降到2014年的第三位，低于美国的两家大银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但是这种程度的股价波动时常发生，不致引起中国发生金融危机。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会对这四大国有银行提供保障，不会让它们倒闭，以避免金融风险。

看了上面美国的报道，我觉得它们是有偏见的，把中国银行的坏账与金融

市场的风险说得太严重。但是风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必须留意。可行的处理政策，是让中国企业自己偿还欠商业银行的债务。如果不能偿还，政府应当让这些企业破产。这样做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第一会使中国企业养成自负盈亏的习惯，提高企业效率；第二会使中国的商业银行财政独立，自己承担贷款的风险，有效利用资金，不能靠人民银行负担它们的坏账。上面说的是在一个自由市场正常运作下应当遵循的规则。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却不是照上面的政策做的。政府动用大量公共资金挽救了几家大型企业，把财政资源供给有需要的企业。中国和美国的情形不同。中国的金融市场比较保守，不像美国的金融市场容许消费者、银行与投资者过度冒险。美国的消费者不用首付款就可以买房子，金融机构可以把银行贷款包装成证券卖给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在美国也有人反对政府用大量资金挽救可能破产的企业，认为这一政策是错误的。中国的金融市场比美国稳定，可能破产的企业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如果管理失策出现亏损，就应当让它们破产。从这次的经验中，中国可以找出适当的途径发展金融市场，鼓励企业提高效率，使中国的经济顺利和稳定发展。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美国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坏账问题和金融风暴，是有失偏颇的。第二，这样的报道也提醒我们应当制定合适的政策来开放金融市场并容许部分企业倒闭，以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演讲中的三个宏观经济议题

伯南克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11年前到美国联邦政府工作，当了8年美联储主席，2014年1月卸任。2014年4月1日他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就他的从业经验做了演讲。其中有三个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把这三个议题介绍给读者，同时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以前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只有两个：一是控制失业率或维持充分就业；二是稳定物价，避免通货膨胀。决定任务的主要因素是先决定哪种宏观经济现象是不能容许的，如失业率太高和通货膨胀太严重。以前，稳定金融市场不是美联储的任务或目标，只是完成前两个目标的工具。因为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不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大毛病。2008年后金融市场不稳定是美国经济大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大家认为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与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样是宏观经济运行不正常的表现，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所以它和失业、通货膨胀一样重要。因此稳定金融市场变成美联储的第三个主要任务。为什么从前稳定金融市场没有现在这样重要呢？原因是现在金融市场发展了，市场的生产和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很多居民在金融市场就业，或做金融投资，交易股票或其他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产品价格的波动和通货膨胀一样，会影响很多居民的生活，所以美联储现在把稳定金融市场作为第三个任务。将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后，中国人民银行也可能把稳定金融市场作为与稳定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同等重要的任务。

第二，我们应如何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伯南克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已经就任美联储主席，有很多他在任时施行的政策被民众评论。当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也有同学问他某政策是否适当，他决定政策时有什么根据。美联储的重要政策包括决定应否挽救三家大公司，其中有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因为它购买了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且出现巨额亏损，在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但政府决定不挽救它。然而当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与美国国际集团（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发生类似的问题时，政府与美联储却挽救了它们。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家保险公司，可是也受到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因为它的顾客在金融市场波动时亏了本。美联储决定挽救这两家大公司的部分理由是觉得如果它们倒闭了，会使整个金融市场不能继续运行，导致持有它们股票的其他企业和民众损失惨重，甚至破产，这样会降低国民收入和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救助它们的害处是可能会养成企业日后偏好冒险投资的习惯。决定应否救助某企业，须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批评和判断某一项金融政策或一般性的政策时，不能只看政策实行以后对经济运行影响的好坏，还应该从制定政策时的环境与信息来判断。

第三，容许在金融市场自由交易可能对一国的经济有害。市场经济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应当让双方自由交易，且一定要对双方有利。如果对某一方无利，这一方就不会进行交易。因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是由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组成的，所以让每个社会成员，不论个人或企业自由交易，对社会是有利的。为什么容许在金融市场自由交易可能对社会有害呢？在什么时候金融市场自由交易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以致需要加以控制呢？首先我们要说明高风险的交易可能对社会不利。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时，房地产泡沫首先破裂。消费者不用付首付款就可以买房子，他们看到房价上涨，且预期它会继续上涨，便购买房子，而房价被抬得过高后便会下跌。许多买了房产的人，还有贷款给他们的金融机构都破了产，以致整个经济出现滑坡。这是容许个人或企业从事风险交易的害处，所以高风险的自由交易可能是对社会有害的，是需要限制的。上面的例子说明，有时候应当禁止某些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但是如何能够判断哪一种具体的高风险经济活动是必须要禁止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好比在市场经济中哪些具体的经济活动应当由政府参与，也是经济学界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了解金融市场运行会影响宏观经济活动，并赞成需要政府稳定金融市场的经济学家，可能觉得维持经济稳定比刺激经济发展更重要。一般来说，从事高风险金融活动从短期看可能会使经济快速发展，但最终会导致经济的波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政策旨在减少经济波动。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得很快，可能需要有适当的政策保证金融市场或整个市场的稳定，以减少中国经济的波动。

教育与学习的明天

教育与学习是在中国传统中最基本的观念。《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样的传统，使在美国居住的中国青年学生读书的成绩比一般的美国学生好。甚至一些美国家庭不愿意搬到有很多中国人居住的地方，避免他们的孩子受到在学校念书的压力。我在本文讨论录像和电脑网络在教育与学习中的用途，以及今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发展方向。

代替老师教学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学生是被动学习，第二种方法学生是主动学习。第一种方法是把优秀老师的演讲录像，给在本校和其他学校的学生看，学生犹如面对面聆听老师授课一样。用这种方法，可以代替本校和其他学校的部分老师，扩充授课的内容并提高授课质量。

第二种方法是让学生面对某种工具，如电脑，电脑给他信息，他要反应，像玩游戏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学校用电脑教授统计学的课程。学生看到电脑的信息，如解释某种方程，可以等到明白以后再继续向电脑学习，学习的速度由学生控制，不像听课时不能请老师讲快或讲慢些，比听课有效。学生还可以问问题，让电脑回答。电脑也可以向学生问问题，等他回答对了才继续讲课。最近美国训练陆军也准备使用同样的办法。军人不面对教练而面对教学设备，好比使用一部汽车在一个安全的大广场练习开车，没有教练，但汽车自动与学生对话，像现在开汽车，司机把目的地决定以后，汽车会根据当时的地点告诉司机应当走哪条路线。美国用这种方法训练陆军，像上面提到的教统计学一样。

关于教育手段在美国最近的发展，2014年6月1日哈佛大学商学院在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该学院应否以及如何用录像教学。结论是肯定的。与它竞争最激烈的商学院，如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已经开始用录像授课。这两所商学院每门课的成本只有两万至三万美元，但一位教授的课程能普及百万学生。哈佛商学院计划开设的课程成本高而没有如此简单和公开。它的HBX项目将于6月11日开课，与该学院传统的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不同，这门课是为MBA前的学生开设的。在5月时，HBX已录取了几百名二至四年级的学生。计划教授针对管理人才的三门课，包括会计、数理分析与经济学。教学在九周内完成，学费1500美元，需要修完足够的课才能参加考试，拿到证书。上面说了美国几所著名商学院采用了录像授课，但是美国一般大学的本科与研究生院还没有采用录像的方法教学。我认为老师与录像并用是最理想的。老师与学生一同看录像，然后老师解答学生的问题，和他们讨论。这与讨论班（seminar）

一样，由一位教授讲解他的论文，其他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

要讨论教育方法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应考虑中国教育的水平比美国低，好的师资与教授也不足。学生人数多，如果好的教授不够，用录像的方法教学，上万名学生能听到最优秀的教师授课，他们的老师和教授也可以一同听课受益。教授同时可以解答学生的问题，和学生讨论课程的内容，像一般情况下由教授本人授课一样。教学的水平提高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所以用录像教学应当在中国发展。

发展的政策，不一定应由政府部门施行。政府只要鼓励每所学校自愿发展，必定会有学校采用录像授课。成功以后，其他学校会努力赶上。如果有人反对用录像授课，我们也无须争论，只要容许愿意使用录像授课的学校作试点。试点的结果，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最后，我要说明，上面提出的教学方法，不能代替一流的教授指导博士生。训练研究生不能没有好的导师，研究生需要导师给予研究的思路，与导师交谈、讨论、交换意见，请导师批评博士论文的内容。没有这种训练，不能拿到合格的博士学位。我在本文建议用两种工具代替由老师指导的方法，只能提高中国普通教育的水平，不能把中国对博士生的培训提高到世界最高的水平。

事在人为㊟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岭南大学在广州设立，被称为中国南方的最高学府。在上海、香港地区与新加坡都设有小学分校。我从小学二年级就读香港分校，直到1948年在广州岭南大学读完一年级后到美国留学。

1952年中国教育部取消了国内所有的私立大学。中山大学搬进岭南大学的校园。1986年中山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当天晚宴时我得到中山大学李岳生校长同意，由他向教育委员会申请在中山大学建立岭南（大学）学院。在1988年正值岭南（大学）学院建校100周年纪念，李岳生校长宣布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岭南（大学）学院在中山大学成立并于1989年建成。2014年是建校25周年纪念。回顾这25年学院的发展和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教育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培育师资。一所大学或学院的好坏，最重要的因素是师资。不像数学、物理与化学，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是从1984年教育部请我在北京大学主办微观经济学班才开始的。所以经济学的师资还是需要有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教师。近七八年来有三十多所中国的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和教授们每年1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时，便前往招聘教师，岭南（大学）学院也在其中。到2014年学院的教师人数已达到98 位；最近三年招聘的教师有70%拥有欧美大学的博士学位。

第二，根据改革开放的原则，与国外大学合作。岭南（大学）学院1999年与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开始合作建立IMBA（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培训班。师资来自斯隆管理学院，基本教材也取于该院，内容还举用中国的例子。该项目很成功。2003年岭南（大学）学院又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管理学院合作，培训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由明尼苏达大学授予。这是中外合作培养EMBA的开始。从岭南（大学）学院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展的概况。

在2014年6月27日岭南（大学）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共有1409人，包括博士20人，各科硕士596人，本科毕业793人。学院邀请我致辞。我觉得毕业是同学们的成就，是“事在人为”的一个例子。我用这四个字勉励他们，还把我用这四个字勉励自己的一些经验告诉同学们。演讲词包括：

“你们的成就是‘事在人为’的表现。今后你们怎样继续今天的成就，要注意两个字：‘事’与‘人’。‘人’又分为‘你个人’和‘别人’。

“先谈事。要干什么事？这是你们毕业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你们多数人

已有答案。我的建议是应当根据你的兴趣决定。有兴趣的事，你们会自愿地干，努力地干，快乐地干，会干得成功。从你是社会一分子的角度看，你应当干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事。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也是中山大学和岭南学院的精神。

“关于你个人。你干什么事都要把握住机会。机会错过了便不能做你可能做成功的重要事情。关于别人，你干许多事都需要和别人合作。你要了解别人的兴趣和目的。不能只考虑你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他的兴趣和利益。如果一项事业对你的伙伴有利，他会尽力去干，尽力和你合作，事业便会成功。不然他不会努力和你合作，事业便不会成功。

“关于我的经验。我在1951年大学毕业后，对计量经济学特别有兴趣，所以决定去芝加哥大学攻读计量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大学是唯一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我曾在几所大学教书，还在IBM工作过，这些都是缘于我的兴趣。

“后来我想替社会服务。当时台湾地区正需要经济顾问。我把握住机会，从1965—1979年每年夏天去台湾地区参与解决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后也把握住中国教育部邀我将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的机会，在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举办了多年的经济学培训班。后又与教育部合作，选拔了160多位中国最优秀的研究生，将他们介绍到美国与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我同时参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贡献一己之力。与教育部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合作，就是有共同目标干对双方有利的事，所以能干得成功。”

---

1. 2014年岭南（大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如何学习经济学(注)

中国对经济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一向不如理工科，因为大家认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更需要的是理工科学。“科教兴国”的口号是指（自然）科学与工程教育，或者说通过推广（自然）科学与工程教育来复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们才发现经济学的重要性。不懂经济学便不能认识如何改革，如何建设市场经济，如何制定适当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因此学习经济学的人数增加了很多。

经济学有三门基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这是每一个经济学的本科生与一年级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分析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也可以称为个体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分析整个经济的活动，也可以称为总体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个体或总体经济的各种活动。利用这三门课程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经济领域的问题。与微观经济学有关的经济领域包括：（1）劳动经济，它利用微观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研究劳动力的供求，来决定工资与就业和失业的人数。（2）人口经济，解释生育与死亡的人数，预测人口年龄的分布，可以知道将来人口会不会出现老龄化。（3）产业结构，也利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一个企业的运作，如什么结构可以增加该企业的生产效率。

与宏观经济学有关的科目包括：（4）经济发展，说明一个国家发展的因素与速度，也利用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明一国国内的劳动力与企业的经济效率。（5）国际贸易，用贸易理论说明一国的进出口。因为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自由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经济学界一般主张自由的国际贸易。唯一的例外是在发展一个新产业时可以用关税来保护该产业的发展。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汇率的决定。汇率是根据进出口与国际投资对一国货币供求的影响来决定的。（6）金融经济，研究金融市场的运作。企业投资与生产需要的一部分资金是由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市场也包括股票市场。此外还有关于研究经济方法的（7）数理经济学和（8）行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是用比较高深的数学来分析经济理论。经济学一般假定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与企业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但有些经济学家不完全接受这个假定，他们还利用其他的假定，如一些心理学上的假定，来解释经济现象，或用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人们的经济行为。

学生选修各门课程的意愿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学金融课的人数增加了。对一个课程需求的增加会影响毕业后的就业机会与工资，这便会影响同学们选择该课程的意愿。不过同学们选修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一门课程时，还是应当根据个人的兴趣来决定。单为选修了某

个学科后可以得到较高的待遇，毕业后事业不会成功，生活也不会快乐。

选修经济学的收益是得到经济学的知识后可以用它来理解经济的运行，还可以利用它来决定重要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如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美国的美联储）执行，用控制利率与货币供给来影响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财政政策是利用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来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以此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微观经济学内的各科可以用来改良经济制度和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决定国有企业的权责是否应与民营企业的一样，是否应给它们特有的经济权利，这种权利对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有什么影响。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与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相同。先要作一系列假定来解释经济现象，再用证据来验证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学习经济学的方法不能单靠记忆，还要明白经济学的理论，能够用它来解释经济现象，必要时还能用来制定经济政策。中国的同学学习经济学以后，可以用它来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运用了经济学才取得成功。

---

1. 本文为作者在访问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时，所做的题为“攻读经济学须知”的演讲。

美国的经济学会年会

每年1月初美国经济学会与其他相关经济学会联合召开年会。2015年的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参会人数约有11000人。召开年会的目的有三：一是让会员有机会发表论文。发表论文时有指定评论的会员，做报告时会员有机会交换意见。二是各学会的会长与干事开会，讨论并决定会务。三是让经济学院校到会招聘，与获得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会员见面。因此对一般会员来说，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是非常重要的。我对年会的观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第二部分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因为它被认为是年会中最重要的演讲，并在学会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

先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这可以从我赴会参加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CES）会议开始。该学会是在1985年由几位美国留学生发起成立的。其中两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于大海和杨小凯。于大海在没有聘请律师的情况下便在新泽西州合法注册了该学会。30年后的今天，该学会会员约有400人，每年在中国开会两次，在美国独立开会一次，不包括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在中国开会一般是与某所大学合办。开会时选定一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重要议题，由会员与中国经济学家发表论文，互相讨论。年会也常邀请外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参加。这次在美国举行的留美经济学会年会，请了中国一些重要的经济院校领导报告其院校在经济学方面的活动。开会时也让一些来美招聘的院校解说它们的工作环境与需要聘请哪方面的教授。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方面的活动。从1985年开始到1996年，中国教育委员会（后改为教育部）在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因为经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所以简称为福特班。从1988年到1993年这样的福特班也在复旦大学举办。福特班培训的一部分研究生得到班上任教的美国教授推荐到美国留学。其中有些人毕业后回国推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十多年来，通过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招聘教师，扩大了中国经济学教师的队伍。每年有约35所院校来招聘。来美招聘的院校待遇高，甚至高于美国一般院校的待遇，而且工作环境也好，同事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有些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也不容易被中国院校招聘，证明中国一些优秀经济学院校的水平已相当高。这是令人备受鼓舞的。

按照惯例，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以前，要颁发学会当年选出的“杰出会员”（Distinguished Fellow）证书。往年只有一位杰出会员，近年增加到两位，2014年则有四位。我是其中之一。2014年学会的会长是耶鲁大

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控制碳排放的国际集团。演讲先用数据说明从1970年后碳排放每年使地球气温增加。问题是如何组织建立一个限制碳排放的国际集团，同时禁止已参加的会员退出该集团。1990年《京都议定书》签约后同意限制碳排放的国家先后退出，到2011年连美国也退出了。这一经验表明单用合约来限制国家集团的碳排放是不会成功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签约方继续守约。诺德豪斯教授的建议是用经济制裁来强制会员守约。经济制裁包括由守约的会员方提高从违约方进口货物的关税，和提高违约方进口能源的价格。

演讲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是协定的内容，即每个会员方每年容许的排放量。这个问题在我出版的《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一书第九章第5节做了回答。我建议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每个会员国投票建议每年全球容许的碳排放总量，以投票数量的中位数来决定总排放量。决定后的总排放量根据每个国家的人口分派给会员国。这一建议的理由是全球的空气是由全球居民平均拥有的，每人利用空气排碳的权利均等，即用分配碳排放许可证来控制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每个国家可以把分配到的许可证自由买卖。如果人口众多取得较多许可证的国家需要资金帮助经济发展，可以出卖许可证。但利用资金来发展经济时须减少排碳量。我认为只有依靠联合国会员遵守联合国决议，这一方法才能施行。经济学会会长还建议要依靠会员国家同意每年全世界碳排放总量，并同意用经济制裁来控制违约会员。会长提出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只能简短介绍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什么是“邹氏检验”

我的女儿行医。月前她告诉我与她合作研究的同事用“邹氏检验”（Chow test）做他们的研究。女儿知道这检验是我发明的，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我想可以解释如下。

在日常生活中或做研究时我们常要研究不同变量的关系。“邹氏检验”是用来鉴定变量1与变量2的关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下是否相同。例如医生需选择药剂以降低病人体温。变量1是病人的体温。变量2是用药的日数。两个不同的环境是两种不同的药。用实验数据来决定病人体温（变量1）与服药日数（变量2）的关系是有误差的，因为每个病人对药的反应不同。“邹氏检验”是用来决定用两种药后病人的体温和用药日数的关系是否相同。广义的“邹氏检验”包括多变量的关系，如变量1与变量2、3、4、5的关系在两种不同环境下是否相同；也包括用来鉴定多变量的关系在三四种不同环境下是否相同。

我发明“邹氏检验”的经过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论文的题目是“美国汽车的需求：一个关于耐用品的研究”。论文在1955年写完，1957年整理成书出版。出版一年后我的导师打算把我的论文和我以后继续研究其他耐用品需求的论文编成一本书出版。当时因为我的论文已经出版了，我只能另写一篇文章给他。我的论文利用1921年至1953年的数据，估计了美国汽车需求量（变量1）与美国消费者的收入（变量2）和汽车价格（变量3）的关系。我想知道这个关系在1953年后的三年是否不变。要回答这一问题我发明了一种检验方法，后来被命名为“邹氏检验”。“邹氏检验”不但可用来比较两个或多个变量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如在1957年前后美国汽车需求与居民收入和汽车价格的关系，也可以用来比较两个或多个变量在不同环境中的关系，如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汽车需求（变量1）与其他变量（2与3）的关系是否相同。

在我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也常用“邹氏检验”。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的关系。我们知道物价指数P与货币供应M和GDP之比（M/GDP）有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是物价指数P的变化，所以与M/GDP的变化也有正相关关系。因为通货膨胀的变动是滞后的，去年的通货膨胀率也会影响今年的通货膨胀率。这样我们便可假定通货膨胀与上面两个变量和其他变量有正相关关系。我研究的问题是1987年中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后，这个关系是否一样。读者或会认为改革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决定通货膨胀的因素与改革以后的不同。我用“邹氏检验”发现在两个时期这个关系是一样的。读者也许还会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物价是由政府控制，而在实行市场经济时是由市场决定的。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只能在平常的时期控制少数的物价，在非常时期不能控制所有货物的平均价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在“大跃进”后的1961年，零售物价指数增加了16.2%，因为中国的GDP大幅降低。根据我的方程，M/GDP决定物价指数。GDP下降，物价便会升高。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我在《经济学快报》（*Economic Letters*）2010年9月发表的文章。

“邹氏检验”在数理统计学理论方面的创新并不大，但从上面举的例子可见，它的应用领域很广。在经济学方面，它常常能用来解答如上面解说的重要问题。由于“邹氏检验”的应用甚广，每一本计量经济学的教科书都把它包括在内。差不多所有经济学的研究生和多数三四年级的本科生都读过。五十多年前为了研究美国汽车需求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在1953年前后是否不变，我发明了这个检验，并于1960年在世界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学刊》（*Econometrica*）发表，数年内常被引用，后来为应用方便被称为“邹氏检验”。

民国初期广东省的财政金融

《信息时报》在2013年12月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民国广州银钱业的那些风云人物”。中山大学王则柯教授查出文章的主要作者是陈晓平。“风云人物”的第一位是家父邹殿邦先生。“广东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邹殿邦（1895—1993），广东番禺人，20多岁成为百万富翁，长期担任广州银业公会主席、广州市总商会主席，参与过近代广州不少重大事件。”后来我阅读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父亲的自传。自传记录了他在1914年至20世纪40年代的金融事业，这些内容可以用来探讨当时的财政金融制度与广东的商政关系。本文先说明今天财政金融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把它和家父自传中记录的当时对同一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做比较。

今天政府的财政可分两部分：收入与支出。收入主要靠税收与贷款。当收入不足需要贷款时，政府可以发公债让人民或中央银行购买。今天的金融业主要是由商业银行处理。商业银行是借贷资金的媒介，它从民众手中引进资金贷给企业。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也可由中央银行提供。

关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可追溯至1907年清朝大臣梁燕孙先生推动和协助一些企业家建立了交通银行，该银行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营业。但在民国时期旧式金融系统的钱庄还是很活跃，继续承担资金借贷的任务。钱庄与银行不同：它的资产可能是属于个人的，没有股东，它的资金不但能借给居民和私营企业，还能借给政府。当时父亲开办了一家大钱庄，名为广信银号。一系列政府举办的重要项目需用的资金都是由父亲开办的钱庄供给。自传记录如下：

承当局委托为供应广东造币厂之银料统一供应商。然当时军政费用，端赖税收，所需银料，须自行筹购供需，而后于税收陆续拨还。余长期因应。

这里说明政府在管理造币厂时向父亲长期借款。

军政费用时有孔亟之需，向余先行调借……故举凡公用事业之兴办参与，如粤汉铁路，广州电力公司，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先后被选为董事。

（1921年）革命军旅犹未建立……故一方面求政事之革新，兼作建立黄埔军校之筹备。财厅乃以招商承投厘金之决策，以图固定预算上之收入……厅长廖公（仲恺）……属意余出而投承。

另一有关的题目是在筹办重要项目时政府与社会知名人士的关系。当政府项目影响居民生计时，知名人士是否能代表居民向政府投诉。自传记录了以下的三个例子：

民国二十年，粤政为陈公伯南（济棠）主掌。（陈公锦涛）有一要事烦（余）条陈于当局者……曰：“……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原为公私合营，（陈伯南政府）乃一纸令下，即将全部民股没收归公，丝毫不与补偿……”后余与陈公伯南同宴，以陈锦涛所言代达……伯南公……承认经办人员失当……卒令民股皆得合理之补偿，毫无损失。

随后因在市之东郊辟筑机场，征用民有土地……李姓私地多顷，被征用而未于与给值，征用后之地税仍向原地主追缴……受宗族同乡之请托，向当局交涉……余乃先访番禺县长陈伯任申述经过，请于补偿，并免征地税，陈县长即席允准免缴赋税，但征用地价之给值，则先由原所有权人依法税契，据为定值补偿……

陈公伯南治粤期间……而后又因李公福林之族人某君被控私藏军械，被判终身监禁。李公查知事属枉屈，托余向陈公面诉，经陈公亲令法外施恩……由余具保释放。

这三个例子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事关系可以影响政府的决定，包括滥用权力的决定。有人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从孔夫子的学说开始，法律已被示为不如道德与人事重要。在民国时代，社会知名人士，尤其是在金融界有资金并常帮助政府完成重要项目的知名人士，在必要时能影响政府官员的决定。

企业家王健林与事业成功的要素

王健林被认为是今天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本文先简单阐释他成功的故事，再讨论一位企业家或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取得成功的要素，供读者参考。

据资料显示，王健林生于1954年，1988年在大连创立万达集团，形成万达商业、文化旅游、电子商务、连锁百货四大产业。截至2014年，企业资产5341亿元，年收入2424.8亿元。

万达商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已在全国开业109座万达广场、71家酒店，持有物业面积2157万平方米；建设中的万达广场70个，酒店69个，物业面积1747万平方米。2015年1月，在香港上市的万达商业（03699.HK）市值超过2200亿港币。

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文化旅游企业，注册资金50亿元，资产490亿元，2014年收入341亿元，旗下包括电影制作、发行、院线，电影科技娱乐，舞台演艺，主题乐园，儿童连锁娱乐，旅行社等多个产业。文化旅游正成为万达新的支柱产业。

那么，一个企业家取得成功需要哪些要素呢？

第一，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最成功的人必须具有天赋。但不同事业需要不同的天赋。如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体育健将的天赋是某种知识或技能比一般人强。这种天赋是内向的。企业家的天赋是外向的，包括了解和应付随时变化且十分复杂的市场环境，以及预测市场变化的能力。企业家不仅要像音乐家或科学家可以自我创造，还需要看出在市场内某种企业有发展的机会。一流的专业人才一定要靠一流的老师，而有天赋的企业家可以自学。如李嘉诚、王永庆都没受过高等教育。成功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体育健将则不能没有受过教育和一流老师的训练。

王健林、李嘉诚和王永庆的故事，说明了成功的企业家的天赋包括有眼光，能把握成事的机会，能看到市场环境的需要，以决定投资于需要的项目。天赋比出生环境重要。但是如果有更好的时世或机会，有天赋的企业家将会更为成功。

第二个成功的因素是人事。一般来说在中国干事业要靠人际关系。企业家要事业有成需要靠人。中国的企业家需要靠政府官员帮忙，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王健林能建起如此有价值的房地产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项目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能推动官员的事业。这便是他付给政府官

员的回报。

与人事有关的第三点是具有管理能力。这点是很明显的，不需要说明。我有一点小的补充：成功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或体育健将并不一定需要具备管理能力。但是无论在任何机构当领导，如校长、省长或美国总统等，都需要具有管理能力。

第四，有适当的环境。最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在一个庞大的市场从事经济活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的范围大，这为有才能的企业家发挥他们的本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有才能的企业家还能利用世界市场，把企业扩展到其他国家，像王健林把他的企业扩展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他在全世界控制着成千上万的银幕，服务的电影观众比其他任何一家院线都多；他向四个大洲的房地产项目投入巨额资金；正在修建的摩天大楼将会重绘伦敦和芝加哥的天际线；他同时也在计划收购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

中国还有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共同推动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繁荣。

中美儿童教育的评析

大家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儿童教育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应当如何改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本文的讨论只限于教育问题。

现象。儿童教育可以分两部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它们是相关的，因为家庭和学校教育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反映社会的特征。学校教育反映人民与政府的需求，家庭教育也是人民与政府造成的。中国的社会与美国不同，以致儿童教育也不同。

中国人民受到比较多的约束，美国社会鼓励人民自由发展。中国鼓励勤劳和努力，鼓励孩子勤奋念书。三字经有句话说，“勤有功，戏无益”。所以有人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在中国，孩子要听话，因此中国的孩子在家里吃饭时多听话，少说话。而美国的父母让孩子多说话。在美国念小学的华侨学生，成绩一般比其他的学生好，因为他们的父母嘱咐他们多用功。

原因。上面说儿童教育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而社会环境必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历史传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是科举考试。考试成功可以当官。职业的排行是士农工商。当官是最高尚、待遇最高的职业。要当官便要勤力地读八股文。读八股文要专心，自己不能随便有独立的思想。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也是要孩子努力读书才能使国家摆脱落后状况。

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很多。三百多年前，欧洲人移民到美洲，靠劳动，包括黑奴的劳动来从事农业，也靠武力占领美洲当地人的土地。西进运动时也是动用武力，所以到今天有枪还是美国人民的权利，以致枪击案时常发生。后来美国工商业发达，科学进步，受教育的报酬也增加了。

后果。中国人比较保守，跟着社会的需要去努力。美国人的事业可以自由发展。在美国有很多好的职业可以选择，社会阶层差异没有中国大。一般中产阶级也可以享受快乐的生活。父母不用强迫子女求上进，而是多让他们自由发展。美国尊重个人自由；中国看重家庭与国家，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美国社会提倡个人主义；中国社会提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社会与历史背景影响了儿童的教育。

当中国孩子有问题时，父母觉得是孩子的责任，要教训他，劝他多努力去改正。当美国孩子发生问题，父母会觉得是因为孩子的能力不足，不要怪他，还要帮助他。中国的父母重视教育，要孩子用功学习。美国父母则鼓

励孩子根据他们的兴趣发展。

上面讨论的是家庭教育，但讨论的内容也适用于学校教育。因为学校教育也同样反映历史传统与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的观点与家庭教育相似。老师在学校管教学生的方法和父母在家里管教孩子的方法也大致是一样的。

中国自1980年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父母对独生子女看得更重要，让他们有更丰裕的物质条件；同时因为父母以后只能靠一个子女照顾，对独生子女的期望更大，在学习和教育上要求更多。

改良。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历史背景与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使孩子面临很大压力。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减小对孩子的压力，鼓励孩子在学习时有机会自由发展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成长时能根据自身的天赋早些发挥独立的思维和创造能力。

普林斯顿大学现代中国中心

普林斯顿大学于2015年8月设立了现代中国中心（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以下简称中心）。此事表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美国教育界的重视。普林斯顿大学师友对此中心寄予深切的期望。本文介绍中心的计划并解说美国大学的运作。普林斯顿大学从密歇根大学聘请了著名的社会学与统计学家谢宇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中心的计划有以下几个方面。

构想

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结构多按学科领域组成，如物理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原因是每一学科都有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如要认识和研究中国现代的问题，应当从一个学科的角度，用它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不然只能了解事实而不能用理论来分析问题。中心的策略是以某些学科为基础来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更理想的是能够结合多学科的方法与思维，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认识与研究现代中国。

组织

中心的组织与大学的院系不同。院系聘请的主要是教授，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院系一般约有20—40位教授。他们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中心的教授有两至三位是与普林斯顿大学另一院系合聘的新教授，和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现有教授为中心兼任教授。行政人员除了主任外只有一位研究员和一位秘书。该研究员的职责是为中心筹款，指导研究生设立与管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数据库。这样少的工作人员能维持中心的重要工作是靠普林斯顿大学其他院系现有的人力资源。中心建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利用大学现有的教学与研究组织，如东亚学系的中国语言课程，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威尔逊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中心的人力资源包括开设上述课程的教授。

教学与研究

中心确保有关中国的社会科学课程将在普林斯顿大学定期开课。例如从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谢宇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当代中国”一课。如有学生修满有关当代中国一定数目的课程，将获得由中心颁发的证书。中心还会举办一系列新的研讨会。其中从2016年夏季起举办“全球研讨会”（Global Seminar）作为本科生课程，该课程将在中国的北京大学授课。届时将会在普林斯顿大学选拔15名本科生前往北京大学，和10—12

名中国本地学生共同上课。

中心将为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提供一年期的科研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hina Scholar Council）将为该项目提供基本资助，不足的费用由中心承担。中心将举办关于当代中国的会议，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某项课题，收集、整理关于当代中国的数据等。还将与世界范围内2—3家具有相似兴趣与愿景的机构保持合作关系，期待与对方进行学术上的协作，同时也会与对方机构每年定期联合举办会议。

与其他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心一样，该中心必须具备千万美元的基金以备支付各项目的费用。某些方面的费用，如某院系兼聘教授的薪酬，中心只需付一部分。中心将创立网站，以展示日常活动和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信息。

中心的教学与科研项目不但会增强普林斯顿大学教学与研究的范围和质量，让普林斯顿大学的师生能增进对现代中国的了解，还有助于推动中美合作。这样的项目，虽然是非官方的，但可以有效地促进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

我希望本文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美国大学的运作和普林斯顿大学对现代中国问题的重视。

经济学家的训练与工作

月前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来采访我关于求学和工作的经验，让我反思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把采访后我的反思记录于此。

我在大学选读了经济学。在美国，到大学二年级时才决定主修的学科，比在中国进大学前需要决定更适当。不论选读哪门学科，都应以个人的兴趣为主。 如果对某学科有兴趣，不但会学得好，日后也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更容易取得事业成功，生活快乐。年轻人的兴趣是由他的天赋与环境决定的。如果对某学科没有天赋，或没有适当的环境来学习和训练，便不会成功。对事业最成功的人来说，天赋比学习更重要。有天赋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会成功，像王永庆和李嘉诚只是靠天赋和努力创立了极大的事业。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不用我一一列举。

想要成功的人必须找到适当的学习和受训练环境。选择好的学校，应从小学开始。有些职业，如音乐家、教授、律师或医生，必须受到充分的高等教育或专门的训练。当然有了适当的训练以后，还需要努力工作，在工作时还要继续学习。

回过头来谈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从一所良好的大学毕业以后，有必要进入第一流的研究生院。选择研究生院时应以院内教授的质量与学术风气为主。有极好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最成功的经济学家都是经过卓越的老师训练出来的。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是从参加研究生院的讨论班和写论文时由导师指导才能学会的。我在芝加哥当研究生时，幸得多位大师的指导，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与多位大师同事，受益匪浅。

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埋头苦干。我当研究生的时候，选修了一门数学。有一天为解答作业中的一个问题，整整花了7小时，才解出答案，而把这个答案表达出来只用了两行文字。用半年至一年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和写一篇论文是常见的情况。做研究的时候，用一周才能解决问题的一小部分也是很常见的。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不是一种主义。一位经济学家可能相信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也可能倡议政府应当征高或低的税收。经济学家的职责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相同。要解析经济现象，例如为什么经济会发生衰退，必须先做出一个假设，再用事实或数据来证实。成功的经济学家能够创立新的理论，对经济学有重要的贡献。因为创立新的经济理论与给出适当的经济政策建议不同，资深的经济学家不一定能提出合适的经济政策建议。合适的经济政策建议可用来建

立市场经济结构或在一个结构范围内用来解决宏观或微观经济的问题。

1965年我应邀到台湾地区讲授计量经济学并参与经济顾问的工作。当时我对经济学已有贡献，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如提出“邹氏检验”等，但是并没有提供合适的经济政策建议的经验。熟悉经济学是当经济顾问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当时我对台湾地区的重要经济问题，不一定能提出适当的对策。这些是后来跟刘大中和蒋硕杰先生等一同任经济顾问得到经验后才学会的。对经济政策问题，如果没有做充分的研究，不宜随便发表意见。这是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应当注意的。

198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讲授计量经济学课。随后曾帮助中国政府建立经济学教育并担任时任总理顾问和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从台湾地区得到的经验大有助益。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但改革大致是成功的。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改革时期政府领导人有能力和决心，还愿意听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中国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多年以后，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进行经济研究，对经济学做出贡献；同时也能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或出任政府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职位。

“十三五”规划的新模式

2015年11月3日北京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我想和读者讨论“十三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有什么区别；今后五年从2016年至2020年中国政府要推行什么计划；用新的模式来描述计划的内容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十二五”规划的内容是以经济部门划分的，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区域与城市建设、能源与环保、教育、科学与技术、人民生活与福利、增强社会治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民主制度、和谐社会与国防。“十一五”规划的内容也是同样的，只是没有包括人民生活与福利和增强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内容的划分完全不同，不是以部门划分，而是根据工作的性质划分，包括各部门的平衡、引进或创建新技术、改进各部门与各职责的质量等。

《建议》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领导思想与基本观念，在《建议》的第一与第二节说明。第二节最重要的声明，是在第三段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第二部分是发展的内容，在第三至第七节说明。第三部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实现“十三五”规划，在第八节说明。要了解“十三五”规划的内容，我将在下面讨论第三至第七节的要点。

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创新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应在各生产要素中推行。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管理和企业。有关的经济活动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还有发展的新空间，包括“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关经济部门包括农业和制造业等。发展的新体制包括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与引进使用的机制。质量和效益还包括财税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等。

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协调发展的部门包括区域的（西部大开发在内）、城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以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融合。

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加快能源技术。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生态安全。

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与世界各国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

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帮助农村与贫困地区的人口脱贫；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与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人民健康；促进中西药的发展；保证食品安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为什么把规划的内容放在经济发展的本质而不在经济部门呢？我想中国的领导人现在已经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多年来从量的角度来看已十分成功。今后的发展应当注重经济与社会的质量，而质量的重要性应当在“十三五”规划中表现出来。干部在推行规划时，不论任何部门，都要注意质量，注意各部门的平衡，注意引进或开发新技术等。如果某个部门，如工业或服务业部门的干部只注重生产数量，不注重质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达到量的增加，质不一定优越。从实行“十三五”规划的立场来说，根据工作的质量与根据各经济部门的数量成就议定规划的内容相比，注重质量的经济发展得到的效果会更优越，更有助于中国建成小康社会。但是在执行规划时，推进以经济发展质量为重的工作会比较困难。我们期望“十三五”规划能够完满地实现。

第二篇 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有泡沫吗？(注)

报纸常有关于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言论。近年我对这个问题也颇感兴趣，因此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牛霖琳教授共同研究，并于2016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供求决定的中国城市房产价格》。文中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释了为什么历年来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而没有发现泡沫。现对此文概述解释。

理论。房产是人们需要的耐用消费品。每年的消费量是所有房子的供应量，而不是当年购买房子的数量。根据经济理论，消费需求q由居民收入y与房价p来决定。y的影响是正的，p的影响是负的。这里用的y与p都已经剔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如果有通货膨胀发生，我们用的y与p也不会影响q。房屋的供应量等于它的消费量q。我们研究的城市房屋是全部城市房屋的数量。供应量由建筑成本c与房屋价格p决定。c的影响是负的，成本增加会减少供应；p的影响是正的，价格增加会增加供应。用简单的数学语言来描述，需求方程用y与p来解释q；供给方程用c与p来解释q。假定y与c是已知的，这两个方程可以用来解释两个变量p与q。得到的结果p与q都是由y与c决定的。也可以说得到的结果是两个方程式。第一个用y与c解释p，第二个用y与c解释q。

第一个方程便是本文用来说明中国城市房价p为什么上涨得那么快。p的上升大部分是受y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城市居民的收入y也增加得快，y的快速增加使房价p大幅上升。换句话说y的增加影响了房产需求的增加，但供给的增加没有那么快。当需求大幅增加而供给增加不足的时候，价格便会大涨。这便是中国房地产价格十多年来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虽然上面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房价的大幅上涨，但是解释了多少，是不是还需要用其他因素如地产泡沫来解释，我们还要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数据。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全国的城市。房价是各地房价的平均价格。某时某地的价格可能发生泡沫，这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判断的。我们收集的是从1987年到2012年的数据。1987年以前房产大多由各单位拥有和分配，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数据除c以外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报。p是房屋的平均价格。q是每人均拥有房产的面积。y是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c是建筑材料工业价格指数，从中国经济信息网获得。拿到数据以后，我们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把每个方程式的参数估计出来。好比在用y与c来解释p的方程，有一个参数衡量y的影响有多大，另一个参数衡量c的影响有多大。以后我们还要衡量上面的方程能否满意地解释p，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解释，如用房地产泡沫的理论。

研究结果。我们估计出了每个方程的重要参数。例如收入对房产的需求弹性（收入增加1%，需求会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大约是0.92。价格对房产需求的弹性是-0.78。哈佛大学前教授霍撒克（H.S.Houthakker）在1957年的《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期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收入对各种消费品的弹性做了报告与分析。文中指出，北京在1927年和上海在1929年的居民收入对房产的需求弹性分别为0.940与0.714，和我们估计的0.92接近。最重要的结果是我们用来解释房价的方程能够全部解释1988年到2013年的城市房价，从头到尾的误差都非常小。

结论。根据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利用需求与供给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城市房产的相对价格（除了物价指数上升以外）从1987年到2012年增长了2.3倍那么快，而不需要用泡沫理论来解释。读者如果怀疑这个结论，可以先假定一个具体的泡沫理论，找出数据，用计量方法来验证，看它是否比我们的解释更好。

---

1. 本文详细内容，请参考Gregory C Chow and Linlin Niu,“Housing price in urban China as determined by demand and supply”，登载于网页www.princeton.edu/~gchow中的“downloads”部分。

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的收益何在

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实行市场经济。他同时提倡对外开放，因为没有对外开放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中国过去35年来的经济发展常用“改革开放”四字来代表。对外开放干了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我先说明对外开放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再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地位。最后探讨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今后政策发展的趋向。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中国绝对不欢迎外资进入，认为这是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家剥削中国。改革开放后改变这个政策，要努力引进外资。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有两个要点：分工合作和自由贸易。分工合作让每人做他最擅长的事，提高生产效率。生产以后，自由贸易再增加经济效益，因为自由贸易必对双方有利，不然他们不会进行贸易。国家的生产是由国民的总生产构成，所以自由贸易也增加了国家的生产。市场经济的优点就是分工合作与自由贸易并存。市场的范围越大，上面说的两项活动越有效。对外开放的意义是扩大市场经济的范围，使它的运作更有效。

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以后，货物、资本、人才和技术的生产和交易也得以扩大。对外贸易是货物的交换，引进外资是引进资本，对外投资是资本向外流，引进人才当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对中国有利。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也会随着上面的三种交易进行。这便是开放的意义。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和速度，可以从下面的数据说明。关于对外贸易（进口加出口）的数量，在1980年、1990年、2000年与2012年分别是381.4、1154.4、4722.9与38671.2亿美元。1990年与10年前比增加约3倍，2000年与10年前比增加约4倍，2012年与12年前比增加约8倍。到2012年对外贸易已占GDP的47%。从1990年开始，中国已变成出口盈余的国家。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居世界第一位，进口居世界第二位。出口带动了中国总生产的迅猛增加。关于引进外资，以利用外资的数量计算，在1984年、1990年、2000年与2012年分别是270.5、1028.9、5935.6与11329.4亿美元。关于对外投资，近年增加得很快。到2010年已达到680亿美元，但还是比引进外资少得多。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用GDP来算每年增加约9.4%。上面关于对外开放的各种指标都比GDP增长9.4%多得多。这说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比对内经济发展强得多。

对外开放也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制度与运行。因为对外贸易与引进外

资，中国加强了与外国企业和人士的交流，改进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使中国企业管理的方式现代化。与外国人来往吸收了外国文化，将它和中国文化融合，可能有好坏两方面的影响，但是吸收多少的外来文化是由我们决定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还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有些领域由国有企业垄断，私人企业无法与它们竞争。第二是银行的运行缺乏经济效率，把宝贵的金融资源给了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如果能让对外开放政策尽量推行，可以使国有企业和银行受到外来竞争的压力，提高它们的经济效率。2001年中国决定加入WTO，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外来的竞争，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2013年5月，中国政府提出要增加民营企业的活动范围，鼓励市场竞争与增强对外开放，这正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回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多是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进行，这是适当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还没有完成，表明了改革的阻力还相当强大。这种阻力来自既有利益集团，例如部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支持他们并同时得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改革，但仍任重道远。

中国人在美国多买房产

近日与朋友谈天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人在美国到处购买房产，不仅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买，还在我居住的小城普林斯顿购买。一些普林斯顿的朋友说邻近的几所房子都有中国人要买。城里一所有名的唱诗班学校的校园被中国人买下，设立一所中学给中国学生上学，有些学生准备报考美国大学。我也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买这么多的房产。本文只从经济的立场解释问题，不谈其他因素。

第一，我们要问，中国人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数量与其他国家比较有多少。第二，与中国人民在国内消费和投资比较有多少。第三，为什么中国人近年来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数量增加得那么快。第四，中国人在美国购买房产对中国有没有好处。

第一，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Realtors Association，NAR）在2014年5月公布的调查，中国人从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共买了价值220亿美元的房产，比前一年增加了72%。虽然加拿大人买房的数量比中国人多，但是中国人购房的平均价格超过50万美元，加拿大人购房的平均价格只有21.3万美元（美国人购房的平均价格只有20万美元），以致中国人购买的房产总额最高。我们知道，以全国人均收入计算，美国最高，中国最低。但是在美国买房产的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比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美国买房产的高。

第二，中国人在美国买房产的总值，占国内消费与投资的百分比有多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3年的GDP是568845亿元人民币，按6.2元人民币换一美元算，GDP总值等于91749亿美元。如果消费等于GDP的40%（居民消费只有35%，但企业也会购买消费品），这40%中用来买房产的约有25%。相当于用了GDP的10%，或9175亿美元来买房子，这可能是低估的，因为买房子也是投资的一部分。这9175亿美元中，用了上面说的220亿美元或2.4%来买美国的房产看来算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中国人在美国买房产的总值之高，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GDP总量大，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来买美国的房产。

第三，中国人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数量在近年来增加得那么快还有其他因素。美国的地产不但是好的消费品，如给儿女入学之用，也是有价值的投资。而且因为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这几年上升了，美国的房子以人民币计算便宜了。根据JP摩根2016年4月的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从2012年占GDP的105%升到2016的187%。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银行给私人部门的贷款在2005年是GDP的113%，到2012年增至134%。还

有，如果中国人在中国买地产不顺利，有些人就会去美国购买房产。

第四，我想谈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大量房产的好坏。人们的消费选择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人民的收入应当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使用，或作消费，或作投资，他们自己决定的用途是他们最满意的，得到的利益也可能最大。每个公民得到最大的利益，便是全国公民使用国民收入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且从国民生产的角度来看，国民生产是利用了国家的资源，而要有效利用国家的资源，应当将其用到收益最高的地方，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外国使用。如果用在外国收益大，也会提高国民所得，对国家有利。

中国经济地位提升以后，人民增加在国内外的消费与投资是很自然的现象。

从美苏冷战到四强分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与苏联对立，冷战延续多年。后来苏联解体，俄国也不愿意与美国斗争。不久以后美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越南战争，又攻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是美国最强大的时期。但是打完这三次战争以后美国的地位与经济实力有所衰退。同时中国经济的地位提高了，直追美国。世界呈现四强对立格局，包括美国、中国、欧洲与俄罗斯。本文先讨论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直追美国，再讨论今后四强对立的格局与世界经济可能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经济力量直追美国，可以用GDP来比较。有人会提议需要用人均GDP来衡量。人均GDP是用来衡量一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而GDP总量是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力量。一国的GDP越高，不论人口有多少，国家的经济力量越大。关于中美GDP的比较，我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中已经预测在2020年中国的GDP将会超过美国。2014年5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有以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美GDP从2011到2018年的预测：以同等购买力的百万美元计算，中国在2011年的GDP为11189111，在2018年的GDP为20730037，美国在2018年的GDP为21556047，到2018年中国的GDP已经与美国十分接近。因为中国GDP增速比美国高，根据上面的预测，约在2019年中国的GDP将会与美国相等。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中美的经济力量将会相等。

中美的GDP相等以后，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会由美国、中国、欧洲与俄罗斯分别控制。正如上面说中国的经济力量与美国比较已经提高，中俄的经济力量与欧美对比也同时增强。四强对立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发展趋势可能是比较乐观的。四强和平地竞争，每个强国只用经济力量来增强它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而不用武力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因为自从核武器发明以后，世界强国不愿动用武力以免造成极大的损害。由此世界经济将继续进步。同时四强会在其经济力量的范围内从事经济发展，还会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范围，给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提供财力与人力资源，帮助它们的经济发展。比如中国现在已经在非洲投资，这不仅对中国是有利的，也会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四强继续和平对立，三四十年以后，世界会继续进步。

第二，四强以外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会进步，如印度，有些南美的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了，不一定会有能力与四强抗衡，但也会和

四强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伊斯兰国家有少数恐怖分子，有可能干扰和破坏世界社会与经济秩序，但是还不能破坏整个世界经济的继续进步。

第三，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质量。因为技术进步，人们的生活会改变，例如近50年来电脑与智能手机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好的方面是提高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的效率。人们寻找有关工作和娱乐的资料方便了很多，传递信息快了很多。将来技术还会继续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会继续改变。经济环境也有变坏的可能，例如环境污染比现在更严重，在某些国家不一定有办法改善。

第四，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小规模战争不断发生，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现在中国与邻国在海洋领土的冲突也可能引起小规模的战争。这种小规模的战争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没有大的影响。问题是大的战争会不会发生，因为这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大规模战争对四个大国或联盟没有好处。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大规模战争必定不会发生。回顾历史，战争的发生有时候是预料不到的。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书籍很多。在此我向读者介绍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2014年出版的《变化与冲击》（*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What we have learned-and still have to learn-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我先介绍该书的部分内容，再谈该书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意义。

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是经济生产与投资必需的，因为经济活动需要资金。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衰退随之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金融机构因经营出现问题而倒闭导致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行。在这时候向银行借款的顾客不能偿还借款，银行不能应付大量的提款，挤兑后倒闭。其他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投资亏损倒闭。马丁·沃尔夫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有三：一是金融市场过度的开放与自由化；二是经济全球化，使金融市场的活动范围扩大；三是金融市场发明的新工具，如金融衍生品，使交易的风险增加。

书中讨论金融危机在市场经济是否必然会发生，以及如何避免。快要发生金融危机时，要用什么政策来挽救。作者接受了“金融不稳定假设”，意指长期的经济稳定后总有一天会出现动荡。如果金融危机多年没有发生，在金融市场交易的人便会自满而忽视了积累大量债务的风险。如美国出现了影子银行，增加了大量借贷的风险。

作者认为经济学者与决策者忘记了凯恩斯的市场经济不稳定理论，这是六年来经济衰退的原因。他们认为在金融市场交易的新产品会增加市场的稳定与效率，所以尽量推广衍生工具以及经济自由化，使金融市场回到20世纪30年代时的不稳定环境。书中说如果亚洲与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也效仿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就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不论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基本稳定，书中的讨论，对今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经济学界的一部分人相信凯恩斯的理论，因为它在20世纪30年代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认为市场经济基本是不稳定的，因为经济发展让人民富有以后，国家总生产大量增加，而总消费的需求不足以吸收生产总量从而导致失业人数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繁荣，宏观经济的总需求足够吸收总生产。经济学界有人开始怀疑凯恩斯的理论，并相信了弗里德曼所说，总消费与总生产成正比。当总生产大量增加以后，总消费足够吸收国家生产的货物，不致失业人数过多，需要政府增加支出来挽救。弗里德曼还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货币政策错误，如果适时增加货币供应，大萧条便不会发生。

我们讨论避免金融市场不稳定和挽救经济衰退的政策，无须判断市场经济是否基本稳定或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理论哪个是对的。经济学界对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发生后的对策大致有共同的观点，只是比较保守的政府多用货币政策，少用财政政策。中国今后金融市场的改革可以从本书中吸取教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市场的建立；二是金融风暴与经济衰退发生后的对策。

第一，进行金融市场改革时，不应过多鼓励用新的金融工具作大量冒险的投资。应注重整个经济的债务，不能使其大量增加。如果债务太多，一些银行与其他投资机构会倒闭，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便会发生。美国的总债务，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和个人，共60万亿美元，是17万亿美元GDP的3.53倍。根据渣打银行的统计，在2014年中国的总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在内，是中国GDP的2.51倍。但是在2009年总债务与GDP约为1：1，所以中国的总债务在近5年来增加得很快，我们应当留意。

第二，关于发生经济衰退时的对策，中国政府经验相当丰富。人民银行施行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与货币供应来调整宏观经济活动。关于财政政策，政府也会在必要时，如在2008年，增加政府支出以应对经济衰退的发生，这是我们可以信任的。

论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

我曾用三个因素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那么快。这三个因素是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以及中国还处在初级的发展阶段，可以引进和利用先进的技术。本文要说明的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一个国家需要用什么条件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说市场经济应当怎样运行。最简单的回答是市场经济需要有新的企业继续进入市场，和一部分既有企业一同利用或发明先进的技术来增加生产。

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与提供基本建设。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中国政府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完成了很多基础建设，但没有建立市场经济，不能使经济快速发展。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是伴随着科技革命，利用科技革命带来新的科技，让有眼光和有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建立新的企业来增加生产。今天的市场经济也同样需要企业家引进或发明新的技术来增加生产和盈利。他们在市场互相竞争，适者生存。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如上面所说，中国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了良好的人力资源，中国才能有一流的企业家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企业的运作，如果是合法的，政府的官员不应当干预。中国政府官员干预企业的原因多半是他们可以从中获利。这种腐败的行为是违法的，但也是很普遍的，我们希望现今中国的反腐运动会把它消除。

在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早已建立。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说明当时市场经济的运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不求而民出之。"这说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人分工合作，货物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经济的运行不需要政府干预，只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司马迁的著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内容之外，对中国市场经济史还有很多精彩的分析。篇幅有限，不能阐释。

我们知道中国有三个重要的世界发明，那就是指南针、火药与造纸。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科学与技术没有发展起来？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科技发明没有适当的报酬。社会的地位以士农工商排行，聪明的人趋于努力念八股文考科举当官。科技发明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整个社会的环境支持，结果西方的科技领先，导致中国的科技很多都是从西方引

进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有赖于西方的科技。中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而且可以利用世界上很多科学与技术。只要让中国的企业家能在市场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的经济便会快速地发展。

上述说明了国家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的供应。有了上面列举的条件，增加资本的供应会把经济发展的速度增加。经济快速发展，是假定企业家的投资只用了国内资本，没有谈到引进外资。增加资本的供应能够让企业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十分重要，这一政策能把资本和技术引进中国。资本被有效地利用，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不能让银行把资金给予效率低的国有企业。有了充分的资本供应，中国的企业家才能继续开创新的企业，以既有企业的技术改进来推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总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赖于让企业家有机会引进或创造新的技术，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生产和谋利。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个适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使中国的企业家能自由运作。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得分配。我将在下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论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

我在前一篇文章讨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说明杰出的企业家能够在适当的环境下利用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发展的速度还赖于该国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形成。认识了收入分配形成的因素， 我们便能了解在经济发展后收入分配是否会趋于均等，分配均等是否对社会有利。

要明白收入分配是很简单的。收入只分给两种人：资本家和劳工。每个资本家的收入是从他拥有的资本或资产而来。他的资本越多，收入越多。资本的报酬越高，他的收入也越高。资本的报酬是利润和从不动产得到的收益，如房子的租金。每个劳工的收入是从他的工资或付出劳动力的报酬而来。工资或报酬越高，他的收入也越高。是什么决定资本和劳动力的报酬呢？资本和劳动力都是国民生产或国民收入的要素。当一个要素增加，另一个要素不变，第一个要素的报酬便会减少。这是物以稀为贵，物以多为贱的例子。明白了这一原理，我们便能了解收入分配的形成。

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后收入分配是否会趋于均等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本文介绍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意见。第一位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在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会趋于不均等，到了后期便会趋于均等。所谓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描述了在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均会增加，而后会降低。理由是在发展的初期，企业家有机会投资盈利，积累大量的资本，变得富有。同时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供应便会降低工资，使企业家和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变得不均等。到了发展后期，资本比劳动力增加得快。资本增加了，资本的报酬便会减少。资本家的收入减少，收入分配便趋于均等。

第二位经济学家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在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后财富分配变化的理论。他搜集了近250年的数据，发现在经济发展以后，财产的分配越来越不均。我先要说明这个结论与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冲突，因为财产与收入不同。一个人的收入是他在当年的收入，包括劳动力的报酬和他拥有资产的报酬。他的财产是他拥有资产的价值。一个没有财产的人可以靠出卖劳动力得到很高的收入。他的收入可能比一个拥有较多资产而只能获得低工资的人多。皮凯蒂用他的数据指出资本的报酬率总是比经济增长率高。例如资本的报酬率是100元资本每年收入报酬5元，或说每年的资本报酬率是5%。如果经济增长率或全国收入的增长率是每年4%，便是低于资本的报酬率。结果资本增加得快。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意味着财富或资本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不然国民收入不会增加。皮凯蒂

认为当资本总值增加时，资本家会变得富有，以致财产分配越来越不均。但是我们不能说在这时收入分配也变得不均，因为财产与收入不同。当财产或资本增加时，资本的报酬会减少，可能引致收入分配更为平等。

总结库兹涅茨与皮凯蒂的学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财富与收入之比增加。一方面使财富或财产的分配变得不均；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后期，资本大量增加，它的报酬减少，同时劳工也会积累资本得到报酬，结果可能令资本家与劳工的收入分配趋于均等。

上面讨论的是当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时候，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是怎样形成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应怎样改变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来增进社会福利。这个问题可分两部：第一是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第二是政府应当用多少资源来分给需要的人。政府征收适当的税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用各种不同税率的收入税、消费税或财产税等。收税以后应当用多少和怎样适当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谁是需要的人？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因此收入和财产的适当分配是我们值得思考而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

我在前一篇文章讨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本文先回顾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再讨论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权责。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对社会福利的供应可分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和市场经济成熟后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都是由政府或集体供应。农村的各种社会福利由公社供应，如医疗、职业与养老等。在城市则由国有企业保证职工的固定工作，提供医疗服务和退休后的生活费用。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富裕起来。但是公社的组织解散了，赤脚医生从事私人营业，农民失去了医疗服务和老年的生活保障。有人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人民生活最大的损失是农民失去医疗的供应。城市里的国有企业获得自主权后，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破，有些工人失业，需要自己去找工作。

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后约20年，政府一方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1998年建立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另一方面开始建立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1997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1997年公布的农村医疗制度和1998年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等。在2009年政府计划扩大医疗保险的范围，使覆盖人数增加到9亿人，同时将人均保险费增加到120元。

2015年1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全国居民养老金政策，针对社会福利的需要，保证老人的消费水平，基于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一个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保持一致。资金来源包括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贴三方面。经费方面，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更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个人缴费提供资助。

建立社会福利有三个相关的重要问题：谁负责推行福利工作、如何决定福利范围和如何筹集资金用于社会福利。

1.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传统社会，医疗、养老和失业的费用和相关的保险经费大部分由个人和家庭负担。如果政府决定承担这些社会福利，也应让民营企业同时参与，以增加供应的竞争与效率。各种社会福利可由政府与私营企业同时提供，以扩大福利的范围并提高福利的质量。

2.关于福利的范围，如果福利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福利的种类和价格便会像其他消费品那样由市场决定。如果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在决定福利范围时可用各种方式征求人民的意见，还应让民营企业参加以获知社会的需要。

3.如果社会福利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所需的费用便是福利的价值，如一般货物的价值，由市场决定。如果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同时需要决定福利的范围和支付福利费用的方案。这是政府决定收支的问题之一。

上面讨论政府制定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我们要留意制定的政策常有实施的困难，不能假定制定的所有社会福利政策都能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慢了吗？

本文的目的是从不同角度来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变慢。第一是生产，第二是工资，第三是消费，第四是近年GDP的增长。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经济发展可以用实际的（剔除物价变动影响的）GDP的增长来描述。推动GDP增长的因素有三个：劳动力与资本的增加及技术进步。我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第三版的第五章用了中国GDP、劳动力与资本从1952年到2013年的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本与GDP的关系。发现从1952年至1978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缺乏技术进步，GDP增长绝大部分来自劳动力与资本的增加。从1978年到2013年，GDP每年的增长中约有2.8%是从技术进步而来。这段时间后期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比在前期慢。这意味着从技术进步的观点看，中国的GDP近年来还会像过去三十多年一样继续增长。

增加生产需要劳动力。经济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供应大致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增加较慢。劳动力求过于供，工资便会提高。大家都知道，近三十多年中国的工资水平持续提高。如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是否慢了，我们可以观察近年来工资的增加是否比从前慢了。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从1995年到2004年，城市居民每年的平均工资从5348元增至15920元；从2004年到2013年，平均工资从15920元增至51483元。我们要剔除物价的变动来算实际工资的增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95年、2004年和2013年分别是396.9、455.8和 594.8（以1978年为100）。2004年与1995年实际工资之比达到（15920/455.8）/（5348/369.9）＝2.416。2013年与2004年实际工资之比达到（51483/594.8）/（15920/455.8）＝2.478。因此实际工资的增加在后期并不比在前期慢。用实际工资衡量，直到2013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没有明显下降。

用另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可以看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根据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0年、2000年与2013年，城市居民年均消费分别是1278.9元、4998.0元和18022.6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90年、2000年和2013年分别是216.4、434.0和594.8（以1978年为100）。2000年与1990年实际消费之比达到（4998.0/434.0）/（1278.9/216.4）＝1.949。2013年与2000年实际消费之比达到（18022.6/594.8）/（4998.0/434.0）＝2.631。可见城市居民消费的增速在后12年不比在前10年慢。

回到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实际GDP的指数

（以1978年为100）在1995年、2004年和2013年分别是502.3、1087.4与2608.6。前9年增加到2.165倍（1087.4/502.3），而后9年增加到2.399倍（2608.6/1087.4），比前9年还高。再看近几年实际GDP的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2008年到2013年分别是10.1%、8.3%、10.2%、8.7%、8.4%与7.4%。最后3年的增长率比前30年平均慢了约9.5%。下降的原因可以说是受到美国与欧洲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般人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都会复苏，GDP可能会回到以前的增速。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能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来判断中国GDP增速已经降低。

研究GDP的增长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在中国经济发展时环境污染的增加。物质生产不足以代表经济发展。但本文不讨论环境污染，因为环境污染增加的速度是相当稳定的，把它包括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中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根据上面引用的数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3年为止没有下降。但我们不能说今后也不会下降。当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接近美国以后，技术进步与国民收入的增速将会降低。只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充分的经济数据来说明发展缓慢的趋势已经出现。读者还须要留意本文没有考虑政治因素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定律

经济学的重要定律在世界各国都能适用。本文讨论两个重要宏观经济定律在中国的应用，不但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而且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也能适用。本文内容根据2015年12月我在《比较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发表的论文。我尽量运用简单的文字来解析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但是一般读者还需要细读才能了解。

宏观经济是用来解释国家总生产或总收入Y和与它有关的变量。假设Y等于总消费C，加总投资I，再加净出口X（出口减进口）。本文介绍的定律是用来解释C与I。

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认为解释C的最重要的变量是Y。Y是全国人民收入的总和。每人的消费由他的收入决定。因此总消费C由Y决定。但是观察不同国家在十数年内C与Y变动的关系可知，当Y增加时，C增加的百分比低于Y增加的百分比。因此，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时，C的增加赶不上Y的增加，以致对国家总生产的需求不足，经济不能继续发展。

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不相信这种说法，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消费C。他的理论是C与持久性收入Y_p成正比。当年的收入Y不能衡量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它包括不是每年能得到的收入。弗里德曼的总消费理论只包括两个假设：（1）$C = aY_p$;(2)$Y_p = bY + (1\text{-}b)Y_{p(t\text{-}1)}$，$Y_{p(t\text{-}1)}$是去年的$Y_p$。假设（1）在上面已说明。假设（2）说明$Y_p$是如何决定的。今年的$Y_p$有b部分是由今年的Y决定，另一部分（1-b）是由去年的持久性收入$Y_{p(t\text{-}1)}$决定。把（2）代进（1）我们得到：

（3）$C = abY + a(1\text{-}b)Y_{p(t\text{-}1)} = abY + (1\text{-}b)C_{(t\text{-}1)}$

这便是说，今年的总消费C是由今年的总收入Y和去年的总消费$C_{(t\text{-}1)}$决定。我们可以用Y与C的数据把参数a与b估算出来，同时算出根据方程（3）得到的总消费C和Y与$C_{(t\text{-}1)}$的关系。

弗里德曼用美国的数据证明他的总消费理论是对的，比只用Y来解析C更优。这一研究结果于1957年发表。他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用了从1952年至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方程（3）能解释中国的总消费，而且用“邹氏检验”发现方程（3）的参数在1978年经济改革前后没有改变。读者或许会怀疑这个结论，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了部分消费品的配给制度，也就是说居民只能购买固定数量的这种消费品，但是他们的总消费量还是由方程（3）来决定。如果他们不能多买配

给的消费品，便会把收入用来多买其他的消费品。

宏观经济的第二个重要理论是解释投资I。首先假定（1）投资I是资本K的增加。（2）资本K是一个生产要素。K的数量由总生产Y决定。因此投资I是由Y的增加$Y-Y_{(t-1)}$来决定。如果我们用Y和$Y_{(t-1)}$来解析I，或假定$I=cY+dY_{(t-1)}$，我们会发现c是正的，d是负的，约等于-c。我利用1952年到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证实了这个理论是对的，而且也用“邹氏检验”发现参数c与d在1978年前后没有改变。读者或许会问这个解释投资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都能应用。因为这个理论是从上面的两个假定（1）与（2）演变出来的，（1）是一个定义，（2）是一个生产规律，因此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都能适用。

我曾与殷寿镛博士利用台湾地区从1961年至2014年的数据，证明了上面用来解释C和I的方程也是对的。但是方程（3）的参数b在1996年施行民主后变小了，也就是说今年的收入Y对Y_p的影响没有以前大。人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利用今年的收入Y来计算持久性的收入Y_p，原因是Y的变动很难预知，亦即经济政策不稳定，难以预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英九与大陆议定经济合作的条件，但是台湾地区的“立法院”不予通过，导致无法施行。另一个例子是制定经济政策的行政长官，约两年换届一次，以致经济政策不稳定，还有全体行政长官定期要去“立法院”接受质询，这些都会影响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中国的宏观经济模型

宏观经济模型是用一组数学方程来刻画宏观经济的运行。计量经济学家用统计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模型有两个用途：一是分析和了解经济的运行；二是用作经济预测。我们可以假定不同政策变量，例如政府支出或货币供应的变量，再用一个模型来做预测，便可以衡量不同政策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以此来决定采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介绍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两个简单模型供读者参考。

第一个模型是利用中国从1952年至1983年的经济数据，列出两个方程。一个解释总消费，另一个解释总积累或总投资。消费和投资是GDP的两部分。第三部分是不用模型解释的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解释总消费的方程有两个变量，一是GDP，二是上一年的总消费。要解释投资，我们先要考虑资本是如何决定的。投资是资本数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与GDP成正比。投资便由GDP的增长来决定。

读者或许会说上述模型是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建立的，可能不适用于中国经济。我的回答是：第一，中国居民的总消费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他国居民的行为是一样的。当时中国实行配给必需品的政策，控制了粮食与棉布等商品的消费量。但是，当居民不能多购买必需品时，他们会用收入购买别的消费品。总消费与总收入的关系和别国居民还是一样。关于总投资，我们假定它是总资本的增加，并假定资本与GDP成正比。所以说这种经济变量的关系，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也是适用的。

这个模型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的结果。1985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近年来我再用2006年和2009年的新数据，更新这个模型，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的《经济学通讯》（*Economic Letters*）发表。这些研究所用的模型并没有变化，这说明适当的经济模型是跨时代的。

第二个模型是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模型增加了两个政策变量，即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分别代表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的是研究这两个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模型共有五个联立方程来决定五个经济变量：GDP、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我们要研究各变量的互相关系。一般来说，讨论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例如一个消费品的生产量（假定等于消费量）和它的价格是互相影响的。根据需求函数的理论，当价格增加，消费量会减小。根据供给函数理论，当价格增加，供给量会增加。同样地，在第二个模型中，GDP、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也是互相影响的。下

面我简要讨论这五个变量的相互关系。

第一个方程用定义解释GDP，与第一模型相同。第二个方程解释总消费，是根据第一模型的理论，再加上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可能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总消费可能有正面的影响。第三个方程解释总投资，是根据第一模型的理论，再加上政府支出和货币供应量可能对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货币供应对投资有正向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可以用来增加总投资。第四个方程解释政府支出。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是由政府决定的，不受其他四个变量的影响，但是它可能影响总消费。因此政府支出可以用来增加总消费。第五个方程解释货币供应。发现GDP对货币供应有正向的影响。这就是说，当收入增加时，人们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应与消费有负向的关系，因为当居民增加消费时会把他们的货币用掉。

建立了第二个模型以后，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还可以用模型来做预测。既然能做预测，我们便可假定采用某种经济政策，再用模型来预测政策的效果。这样就可以用经济模型来衡量政策的好坏。

本文介绍了作者研究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希望能增强读者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兴趣。

论近年中国总消费与总投资比例的下降

近年来中国总消费与总投资的比例继续下降。本文将讨论比例下降的原因。一方面解释总投资快速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讨论总消费是如何决定的，我们是否应当将其提高。

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在1978年、1990年、2000年与2014年，消费支出分别占GDP的62.1%、63.3%、63.7%与51.4%；固定资本形成分别占GDP的38.2%、34.0%、33.9%与45.9%（其余的百分比是净出口）。这表明总消费与总投资的比例从2000年到2014年出现大幅下降。

第一，让我先解释总投资快速增加的原因。近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持续增加。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8年、2008年与201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分别为126111亿元、507448亿元与698591亿元，其中国有企业的生产总值为35571亿元、46857亿元与57013亿元。国有企业占工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28.2%、9.23%与8.16%。或者说从1998年到2010年民营企业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增加。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民营企业要增加利润，必须增加生产，用投资来扩大生产的规模。如此一来便大幅增加了总投资。

因为增加生产需要增加资本设备，而增加资本设备需要增加投资。这是我们对近年来中国总投资快速增加的解释。其实投资增加的速度远高于资本设备增加的速度。当生产增加时资本设备需要同时增加。假定资本设备是100，当资本设备不变时，也需要约6%的投资来维持它的数量。如果资本设备要从100增加到105，投资便要从6增加到11（6+5）。投资增加的百分比远高于资本设备增加的百分比。这个理论在经济学界被称为“加速原理”。资本设备的变动是速度，投资的变动是加速。

投资增加是一个好的现象，是中国民营企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

第二，我们要讨论中国的总消费量是否太低。讨论的内容是根据80多年来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消费者应有消费自由，他们的消费量应当由他们自己决定。1936年凯恩斯在其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假定消费量是由收入决定，但是当收入增加时消费量占收入的比例会降低。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的大萧条，是因为总消费量增加不足以致生产过剩，失业人数过多。如果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对的，市场经济的GDP便不可能继续增加。但正如我在前文曾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倡议新的消费理论，指出消费量与预期收入（或说正常收入）的比例是固定的，当正常收

入增加时不会减少。弗里德曼凭借这一理论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0多年来我从事研究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985年8月在著名经济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的总生产是如何决定的。总生产分两部分，即消费与投资。该论文用计量方法估算了中国的消费函数与投资函数。消费函数是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倡议的消费理论建立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52年开始的数据估算的结果，我发现这个消费理论是正确的。请注意数据的时代包括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论文证明了经济学的理论可在中国应用，并且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也可以应用。这篇文章的投资函数，是根据上面说的投资理论（包括“加速原理”）建立的。估算的结果，这一理论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和实行市场经济时代同样适用。

20多年后，我想知道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和上面的总投资理论在近年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2011年我在《经济学通讯》发表的论文发现，直到2009年这两个理论在中国还是适用的。上面引用的书籍与文章证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是符合经济理论的。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居民自己决定应当消费多少。自从1952年中国统计数字公报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量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不用把它增加或降低。

试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2015年8月11日中国政府决定降低人民币汇率，把8月10日1美元兑换6.2101元人民币的汇率降到1美元兑换6.3259元人民币，8月13日又降到1美元兑换6.3986元人民币。这一消息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经济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做出分析。

首先简要回顾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历史。我在1980年第一次回国时，人民币的汇率约是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当时的汇率高估了人民币的币值，或说低估了美元的币值。这一判断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没有人愿意用1美元只换得2元人民币。市场价格是在交易双方同意时的价格。2：1的汇率，低估美元的价值以致美元的供应短缺，美元求过于供对中国并无好处的（当时还发行了外汇券，与本文主题无关，故不作讨论）。

我在1984年就已谈到人民币的汇率应当由市场决定。但是，当时那些能只用2元人民币就兑换1美元的政府机构表示反对，汇率改革未能施行。1988年政府没有收回这些机构的权利，但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外汇交换市场，让拥有美元的人用双方同意的价格卖给需要的人。这种价格可以说是市场价格。到了1996年政府决定把人民币的价格贬值到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这一汇率大概接近供求平衡，因为它是根据上海自由交易市场的汇率决定的。

从1996年至2004年，人民币汇率大致没有变动，但从1998年到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是低估的，因为美国的物价比中国上涨得快。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从1998年的3.808降到2003年的3.467，下降了9%，同时美国的零售物价指数由157.5升至181.31。按照两国物价的比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当在2003年上升到1998年的1.26倍，但是它没有上升这么多。因此在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低估了约26%。

从2005年到2014年1月，中国政府继续控制汇率，让人民币的价值缓慢上升。因为人民币价值如果上升太快，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出口企业的利润，不但影响了国家的经济，还会使一部分人民不满。让汇率缓慢上升，使出口企业有时间来调整它们的产量与产品种类，应当说是可取的。到2014年1月，政府让汇率上升到1美元兑换6.05元人民币。到2014年3月1日，人民币汇率略降到1美元可以兑换6.14元人民币。这样升降的汇率可以说是接近由市场决定的均衡汇率。

2015年8月12日《纽约时报》头版以“汇率贬值反映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为

题，报道在前3日内，中国政府把人民币贬值到6.4元兑换1美元，比3天前下降了4.4%。报道说贬值的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政府用各种政策来复苏经济，包括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利率和降低人民币汇率等。

从决定经济政策的立场来说，降低人民币汇率和实行上述的其他政策是合理的。美国媒体看重此事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美国人视中国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希望中国经济增速慢一些。人民币贬值是增速减缓的表现，会令美国民众注意。第二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只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慢慢地变动，现在忽然大幅调整汇率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没有预料到的。

这次汇率调整会不会使人民币变成世界通用货币呢？我认为影响不大。人民币迟早会变成可兑换货币。因为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并不是由人为政策决定的，而是由该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通用程度决定的。如果有大多数国家常与中国贸易，需要用人民币，人民币自然会变成世界通用货币。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贬值没有影响它在国际贸易中的用途，也不会影响它将会变成世界通用货币。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再次将人民币贬值，国际市场便会对人民币失去信心，影响它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的机会。

中国经济影响美国股票价格

2015年8月22日《纽约时报》头版以“华尔街股价大跌两天”为题，报道“美国股市在前一天大跌至低于5月的高峰约10%。此事与中国经济状况有关……2015年8月前3周中国制造业产量下降速度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2014年1月我发表的以“中国经济影响美国股票价格”为题的文章仍可以用来解释此次美国股价的大跌。兹录全文如下：

2014年1月23日星期四美联社报道了当天股票价格大跌的消息，说是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同时指出几天前中国官方报告经济增长速度为1990年以来最低。当天道琼斯股指暴跌175.99点，跌幅达1.1%。

根据2014年1月25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在24日（周五）下降了2.1%，那一周股价的跌幅是自2012年6月以来最大的。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最受影响的是依靠中国进口原材料的企业。据报道，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产量在6个月以来首次下降。还有中国国内的消息，在2014年1月23日的中央国务院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称2014年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我先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再讨论为什么会影响美国的股票价格。

根据这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经验，我们看到宏观经济波动在市场经济中是必然的。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1989年、1990年和1991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分别是11.3%、4.1%、3.8%和14.2%。2004年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中国的出口、总需求和经济增长。今后恐怕中国经济内生的波动会增加。

经济波动的原因，有一种理论我已在之前发表的《美国近年经济衰退》一文中做出了解释。大致是因为消费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过于冒险导致。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地产，金融机构过量贷款，以致房地产价格发生泡沫进而造成经济波动。

另一种理论比较专业，让我分段说明。1.可以将国民收入的总需求分为三部分，可以运用这三部分来解释经济波动。这三部分分别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2.消费方面，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是由国民收入决定的。耐用消费品的总存量也是由国民收入决定的。因为它们的消费与总存量成正比，而消费是由国民收入决定的。3.投资方面，企业用的设备总存量是由国民收入决定。企业一年购买新设备是总存量的增加，所以由

国民收入的增加决定。4.上面说的关系被称为“加速原理”。假定国民收入是速度，国民收入的增加便是加速。国民收入的增加，会使当年企业购买的新设备和消费者购买的耐用消费品增加。5.当国民收入的增加慢一些时，加速便减缓，企业一年购买的新设备和消费者一年购买的新耐用消费品会减少。因此，投资和消费产生的总需求会减少，以致国民收入下降。这是经济波动的原因。可以说这种波动主要是受投资变动的影响。

一个企业决定对设备投资的时候，要预测国民收入的变动，尤其是预测今后此类商品销售需求的变动，因为如果需求量不变，企业不必进行投资来增加它的设备，用现有的设备便可以。这是对经济变量的预期影响经济波动的例子。接下来我会简要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影响美国生产和投资的预期，以致影响美国的股票价格。

中国经济活动影响美国经济是因为两国经济已经融合。贸易方面，中国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来自向美国出售商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的出口减少了。同样，美国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也靠出口流入中国。投资方面，两国也互相依赖。中国经济不景气，减少了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利润。当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以及在中国投资的利润减少时，美国股价会下降。一个公司的股价是由它今天和今后的盈利决定的。更准确的说法是，由购买股票的人对公司今后盈利的预期决定。对中国出口的减少以及在中国投资获利减少的预期，使股票的价格降低。

美国企业对今后盈利预期的变动和美国股价的变动有很多原因。上面说的只是中国经济的变动。当然美国内生的因素也会影响美国的股价。某天或某周股价变动的原因有很多。股价下滑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美联储决定不再大量增加货币供应。经济活动变化常有多种原因，把它们弄清楚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前景

要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下列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看数据，看近年来的经济状态。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中国GDP增加了6.9%，略低于计划的7.0%。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象征。其实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十分微小，不足以得出有关经济增长的结论。比较合理的方法是看多年的数据。例如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大约9.4%。近六七年来平均只有7%～8%，2015年只有6.9%。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是放慢了。我也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不可能像往年一样高，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时，人均GDP水平离最富有的国家很远，能够用高速度追赶。当人均GDP与最富有的国家接近以后，GDP增速便会降低。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种方法也是利用数据，但比第一种更为精密，是计量经济学家常用的。计量经济学利用经济模型、经济数据和统计方法，估算出模型的参数，再利用建立的模型做经济预测。有不少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三种方法是根据政府的预测。比如即将实施的“十三五”规划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201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篇关于“十三五”规划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十三五”规划中，对一些“关键部门”的改革尤为重要。因此，在“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就有望实现U型调整，回到7%甚至更高的增速。

本文讨论中国经济的前景，不是用量化的预测，而是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动力。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人民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我在本文预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从“事在人为”的观点出发。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努力，其中有三点：中国人为什么努力去干？去干什么？怎样去干？

今天中国人的苦干，可能是空前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原因是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太贫穷。建立市场经济以后，致富的机会很多，人民努力去挣钱，这会使国家富强。

通过干什么来挣钱？开办哪种企业都可以。例如当中国大量出口商品到美国，一位明智的企业家利用运货到美国的轮船，在回国时把可以在中国销售的美国货物运回中国。在中国利用这些货物来赢利。这是不需要利用先进技术的企业。近来很多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今天中国的

新技术水平尚不如美国，但利用新知识的程度比美国高。例如中国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各种交易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人能够利用先进技术的一个原因是不少中国留学生受到高等教育后回国工作，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2015年10月我在北京住了约20天，发现不少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利用从美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和新知识回国开办新的企业。

这次北京之行也使我开始比较将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我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不如中国。原因是美国人没有中国人的苦干精神。美国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贫穷以后急于致富。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均等，贫富差异、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中国大。美国人民对金钱没有中国人看得重，拼命干活的人没有中国多。总之，如果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想方设法致富，经济发展便不会像中国一样快。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会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超过美国。

企业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常指出一个国家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采纳市场经济、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这些是必要与充分条件。实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可从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来观察。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缓慢，等到1978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GDP才能在30年间保持约年均9.4%的增速。人力资源也十分重要。如果缺乏专业勤劳的工人与具有才能和眼光的企业家，生产增加的速度不会这样快。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引进和利用世界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率，而像美国这样先进的国家，GDP年均增速不会高于2%～3%。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弱点，如国有企业效率低，同时有得到银行贷款的优先权，但中国经济的总生产已能快速增加。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根据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2013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是48232亿元，其中国有企业占11466亿元，民营企业占33176亿元，民营企业产值约等于国有企业的2.9倍（因有少数其他企业，二者之和少于48232亿元）。民营企业不仅有效率而且有巨大产值，因此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如果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中国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经济发展是由少数最精英的企业家推进的。中国的人口多于美国人口4倍，从中选出最精英的少数企业家会比美国的企业家多。其次，人口众多的国家具有广阔的市场，能吸收大量企业的产品。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后，可以说整个世界市场是每个企业的市场，但是因为外销需要运费，通常还要付关税，因此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企业是有利的。

企业家能够成功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他的天赋、努力与受过的教育。天赋最重要。有了天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十分成功，典型的例子是企业家王永庆、李嘉诚，以及民国初年在广东省金融界领导和当了20多年广州商会会长的家父邹殿邦。当然努力与苦干也很重要，而且不限于企业家。教育的重要性可以从愿意攻读MBA与EMBA的人数看出来。不论当企业家还是选择其他职业，如行医、当教授或当体育健将，都需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训练才会成功。

成功的企业一般都要兼顾其顾客、职工和股东的利益。顾客可以反馈企业的产品是否适当。制造好的产品还需要职工合作。股东不但供给企业的资源，还是企业的主人，有权力顾及自己的利益。因为每个企业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它也应当兼顾社会的利益。20世纪60年代我在IBM公司工作，得知该公司常会资助大学教育。

企业家的职责包括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方向、领导企业的运营以及管理企业的人员。第一点是最重要的。有眼光的企业家才能认识市场的动态。正如上文所说天赋是企业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有天赋的企业家才能发现市场的需求，有些还能够开发新的市场。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工作可以交给适当的管理人员。

成功企业家的思维与成功经济学家的思维类似：第一是选出和认识重要的问题，第二是找出简单的解决方法。领导美国苹果公司的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认识市场的需要，发现了最简单而别人没有发现的用手指控制iPhone的功能。我从事经济研究的原则也有二：第一是要选出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第二是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我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多年，建立了简单的经济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总消费和总投资，也是根据这个原则。

中国的经济已跨过发展的初级阶段，GDP增速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才能的企业家，只要有眼光发现新市场，有创新能力制造出新产品，还是能够像以往一样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篇 经济政策

中国专利与版权的法律能施行吗？

目前，中国人没有很好地遵守并维护有关专利与版权的法律。最简单的证据是根据香港地区的官方统计，2013年有140万内地游客去香港购物，是因为国内有不少仿制品，游客去香港购买正版消费品。还有一些外国公司，常起诉中国公司伪造它们的专利产品，但大多数没有成功。关于版权，有不少国外影片在国内被盗版。

本文先讨论中国对专利与版权的传统观念，再讨论20世纪80年代国家通过保护专利与版权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难以施行的原因，然后再讨论这种法律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专利和版权的概念。由于没有专利，产品随时可以被仿造。例如药店所有的药品都可以仿造。如果不想让别人仿造，就只能制造难以仿造的产品，不把制造方法告诉别人，像云南白药。书籍可以被大家随便抄写和复印，而且有时被别人抄写是作者的荣誉。

关于没有版权的概念，让我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教授。有一天他给我来信，附了一篇他的论文请我阅读和批评。我看后发现论文的内容是我最近在他的大学演讲的讲辞。我提醒他在文章里应说明有些内容是我的讲辞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中国经济一课时，有一位来自中国某大学的教授旁听，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某一问题，我发了一份讨论这一问题的讲义给班里的同学。一周后这位教授请我看他最近写的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我发现他文中的一部分内容是从我的讲义摘抄的。我很客气地告诉他应当在文章里说明那部分是引用了我的讲义。他马上答应。这两位中国教授没有版权的概念是很显明的。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会骗我，而且把论文给我看。他们没有在论文里说明引用了我的演讲或我的讲义，是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概念。

中国制定专利和版权的法律，是顺应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与外资公司打交道越来越多，就要放弃传统的习惯，尊重专利与版权。1984年，中国出台《专利法》。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1994年又签订了关于专利权的合作条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承认了知识产权的合约。这些都说明中国决意遵守专利与版权方面的法律。

现在学者们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别人的论文是违法的。虽然对这种违法行为的监管相当严格，但违法的学者还是不少。因为发表论文的多少会影响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教学报酬。学生也常会作弊。美国的教育测试服务公司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举办考试，把考试分数给美国大学作录取学生之用。因为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很难控制，该公司取消了在中国举办的考试。

有些经济学家不同意专利与版权是对社会有益的。虽然专利与版权鼓励产品的发明与创作，但是这种鼓励效果不一定明显。如果没有专利，很多人也会努力去发明创造，因为发明是自己的兴趣，还令发明家获得荣誉。当一位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了他新发明的理论，获得大家赞许，即使没有报酬也觉得满足。发明者还可以把他发明的产品在别人之前出售而获利。专利是一种垄断，制止其他企业生产这种产品，提高产品价格，但是有些需要使用它的人可能会买不起，比如贫穷的病人买不起需要的药品。专利还会使想要发明类似产品的人，因为怕违反专利法不敢尝试类似的发明，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很难尊重并执行《专利法》与《版权法》。第一是因为中国传统上没有这种习惯。第二是目前在中国的此类非法行为很普遍，因为违反《专利法》与《版权法》可以得到经济利益。经济学有解释犯罪行为的理论。简单地说，犯罪行为是由它的收益与成本相比来决定的。如果收益多于违法的成本（包括违背自己的良心），人们便会决定违法。在中国，违法的收益常会比成本要大，如仿造别人的专利产品，收益常会很大，以致《专利法》难以实施。外国人和中国人都难靠中国的法律来保护他们的专利与版权，所以对专利和版权的保护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有所改善。

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我在高三时使用的物理教科书，是当时中国很著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栋[注]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普通物理学》。后来我想读些英文的物理教科书，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出版比较早的书，发现书中每段每句和萨本栋的教材完全一样，证明萨本栋的教材是从这本书翻译而来，但是萨本栋的书中并没有说明自己的书是翻译的（如果有读者怀疑，可以去图书馆用心找找看）。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萨本栋的贡献。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他在1927年获得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担任母校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37年至1945年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值日本侵略中国，地处沿海的厦门大学受到战火波及。萨本栋带领厦门大学师生西迁至闽西长汀，艰苦办学，培养出了众多优秀人才。萨本栋领导下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双矢量交流电路分析及真空管性质与效能，1943年提出利用真空管解微分方程的可能性，已触及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研究。

---

1. 萨本栋，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曾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

和数学中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得到当时国际电工界的高度评价。对各种真空管的性质和效能也有极深的研究，研究成果被当时的大学广泛采用。和叶企孙等人共同建设和发展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抗战期间，为建设厦门大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否应管制利率与汇率

在正常运行的市场经济中，价格应由供求的均衡决定。如价格比均衡点低，则供小于求，这时需提高价格来增加供给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如价格高于均衡点，则供过于求。这时需降低价格，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利率是借贷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买卖外币（如用人民币买美元）的价格。这些价格是否也应由市场的供求决定呢？

我在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一书的“中国的利率管制与影子银行”一文中批评了中国规定了银行借贷利率的上限，以致利率低于均衡点，使存款少于银行需要的贷款。影子银行由此产生，它们以较高的利率借贷，但增加了借贷的风险。汇率方面，从1980年至1996年政府压低美元的价格，开始是1美元兑换不到2元人民币，到1996年才慢慢升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用官价买不到美元，只有少数由政府许可的单位可以用官价买到。如果当时不低估美元，美元在中国的供应就会增加，会有更多人可以有效利用它。

本文的宗旨是讨论在什么情形下管制利率或汇率可能是有好处的。

先谈利率。利率有多种。在自由市场，借贷自由，谁有钱就可以借给别人，借款利率由双方协商决定。商业银行的建立是为方便借贷的人，有钱的人不用寻找借款的人，并且可以减少贷款的风险。商业银行借贷的利率（借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是一种价格，应当由市场决定。商业银行成立后，政府用中央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来控制国家货币供应量，即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数量。按有关规定，商业银行活期贷款不能多于它拥有的现金与准备金的一定倍数。准备金是由中央银行发给的，商业银行要按一定的利率向中央银行支付利息，这个利率叫贴现率。中央银行可以提高贴现率，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以减少货币供应量。2008年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联储把贴现率压低到接近于零，想以此鼓励商业银行多拿准备金来增加货币供应，推动经济复苏。这个金融政策的效果不理想，因为企业与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不愿意借款投资或购买消费品。当美国利率大幅下降时，如果中国利率不下降，资本便会流向中国。人们把美元存到银行换成人民币，银行用美元向人民银行换成准备金，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便会增加。这时人民银行不容易控制货币数量，结果会引起通货膨胀。一个应付美国低利率的办法，就是由人民银行降低贴现率，使美元不会流入中国。控制贴现率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与控制商业银行借贷的利率不同。银行借贷的利率应当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银行可以跟随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可能有好处，就是提高中国的总生产。增加货币供应量对物价与总

生产的影响，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展开讨论，请参看《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第23章第5节。回到本文的主题，银行借贷的利率不应被管制，而贴现率是应当管制的。

关于汇率应否管制的问题，我们先回顾中国制定汇率的历史。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6年，1美元开始只能兑换1.9元人民币，后来升到8.3元人民币。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在上海建立了自由交易外汇的市场，出口商人拿到外汇可以在市场卖给需要外汇的人来换人民币，汇率由双方自由决定。1996年政府宣布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这一汇率接近供求平衡，因为它是根据上海自由交易市场的汇率决定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96年至2004年，人民币汇率大致没有变动，但从1998年到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请看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从1998年的3.808降到2003年的3.467或前者的91%，而美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同时由157.5升至181.31或前者的115%。按照物价的比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当在2003年上升到1998年的1.26（115/91）倍，但是它没有上升这么多。可以说在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了约26%。后来从2005年到2014年1月，政府才让汇率慢慢升到1美元兑换6.05元人民币。到了2014年3月1日，人民币汇率稍降低到1美元可以兑换6.14元人民币。看到汇率这样的升降我们可以说它是由市场决定的且已趋于均衡。

回顾从2005年到2014年1月，中国政府一直在管制汇率，只让人民币的价值慢慢地上升。这样的汇率管制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如果让人民币价值上升太快，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出口企业的利润，这样不但影响了国家的经济，还会使一部分人民不满。让汇率逐渐上升，出口企业可以有时间来调整生产数量与产品种类。因此有管理地逐步调整汇率来保护出口可能是合适的政策。

中国的环保问题与对策[注]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所罕见，但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也是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空气污染是民众不能忍受的。根据国家环保部公布的有关74个城市的数据，在2013年，细颗粒物已经成为最严重的污染物，其年均浓度大大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微克/立方米的标准。其中有71个城市的年均浓度超过了35微克/立方米的二级标准，11个城市甚至超过了100微克/立方米。2013年，全国平均有35.9个雾霾天，比2012年增加了1倍多。除了空气以外，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也受到关注。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抗议事件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由于中国环保问题如此严重，政府早已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设法加以改善。首先，建立法律框架。《环境保护法》的试行版早在1979年就已颁布，正式版在1989年通过，2014年大幅修订。还有专门法关注某一项环境问题，如1984年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02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其次，加强职能机构。1988年国家环保局成立，1998年升级为部级的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再升级为环保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成功减排了两种主要污染物。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新的减排总量目标，并扩充了污染物的种类。2012年，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细颗粒物和臭氧这两个重要的污染指标。政府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污染中心在2017年必须把细颗粒物浓度与2012年比分别降低25%、20%和15%。然而，由于 “十一五”规划之前的环保目标大多没有实现，以致环保问题严重。现在的目标离根本改善环境质量还有很大差距。本文讨论目前环境问题严重的成因及其解决对策。

目前的环境问题反映了环保管理的缺点。国家的环保行政体系主要分为中央、省、市、县四级。中央主要是制定政策和目标，而靠三级地方政府执行。但是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不到位，是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常常放宽环保标准以吸引企业投资，增加当地经济生产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之间扩大生产的竞争加速了环境质量的恶化。

中央政府可以制定明确的环保目标并进行有效的监测，同时建立报告及核查体系，每年定期公布考核结果。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需要逐级向下传

递，每一级政府都对自己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中央政府必须提高省级政府环保的积极性，省级政府将会相应推动市级政府的环保工作，继而推进到县级政府。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的利益推动地方政府实施环保政策。

其一，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2013年，地方政府在全国的财政收入占53.4%，财政支出占85.4%，支出比收入多了5.03万亿元。中央政府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把财政收入回归地方。如果中央以环保成绩决定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奖励环境质量的改善而惩罚其恶化，地方政府将会积极地推动环保工作。

其二，关于地方干部的升迁。上一级政府掌握下一级干部的考核和任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干部的升迁和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而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经常有负面影响。如果在对地方干部的考核中，更为看重环保目标，给予环境质量改善快的地区的干部更多的升迁机会，便会大大推进环保工作。上面说更为看重环保目标是因为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已有利益，不用中央政府积极鼓励。

本文建议的改善环境政策只需要中央政府公布与落实便会生效。目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环境污染的问题急需解决。

---

1. 本文由邹至庄、徐袁共同完成。徐袁，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与展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现在哪方面改革成功了？哪方面还需要继续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去改？我有幸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时任总理经济顾问和体改委的经济顾问。本文要讨论我在1985年8月13日书面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要点。这三个问题是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今天这些改革成功了吗？如果要继续改革，应当怎样去改，能不能成功？

第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企业是民营还是国有。民营企业的生产占总生产的百分比有多大？在民营企业活动的范围内，有多少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渐进的，不像俄罗斯在500天内把国有企业全部出卖变为民营。中国政府先授予国有企业部分自主权。到1998年，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并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仍由政府控制，主管仍由政府委派，企业的运营和从前的国有企业没有太大分别。现在的国有企业活动范围还是很大。2004年，在规模超过500万元的企业中，国有与政府控制的企业占42.4%，集体所有的企业占5.3%，其他的是民营企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目的是利用外国企业的竞争，改进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提高它们的生产效率，但是政府的既有力量仍然很大，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实现。

中国的国有企业能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吗？因为管理人员由政府委任，而政府根据政治因素，选出来的人才质量往往不如由市场竞争选择的人才。结果国有企业盈利低，缺乏技术创新，以至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缓慢，例如生产的汽车和半导体皆不能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技术还无法赶上世界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难以脱颖而出。

现今中国经济能够进步那么快，主要归功于民营企业的活力。阿里巴巴的成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是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多半是采用现有技术而不是由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

第二，像国有企业一样，中国的银行业仍然保留了计划时代的作风，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只有少量贷给民营企业。所以金融资源的分配缺乏经济效率。银行还给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发放大量贷款，以至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居高不下。如果银行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它们需要财政独立和自负盈亏，便不会给地方政府发放大量对银行无利的贷款，引致地方政府的债务堆积。中国的银行规模很庞大，垄断了金融资源，大量贷款给予国有企业的结果是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国有企业拥有的资源太多，影响资源的有效利用。金融市场因为银行制度不开放，发展很

慢。但反过来说金融市场缓慢发展也有它的好处，如可因此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第三，对外开放的改革大致是成功的。要增加出口，中国产品必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外汇市场逐步市场化，汇率常有起落。到1980年后期，中国的出口已经不受政府管制，因为需要与国际产品竞争，中国的出口需要提高质量，生产多半已由市场决定，但政府还是对出口企业提供补贴。

概而言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到今天它们的经济效率还是很低。国家既有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制度不容易改变。在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与银行的进一步改革恐难以实行。

在东江排放污水的对策

我最近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成立25周年的盛典。有幸听到由许罗丹教授带领的岭南（大学）学院课题组研究东江排放污水问题的报告。课题组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排污企业违规排放污水应当支付多少赔偿。本文的观点是排放污水的企业损害了环境，问题是政府应当容许它们排放多少污水以及它们承担多少处罚。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我的观点可能难以施行，但从经济学的立场来看，它有其合理性。我与许罗丹教授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的意见或有不同，但获益匪浅。

我认为政府不应当完全禁止排放污水。一般来说，污水排放量与企业生产成相关关系。容许企业排放污水越多，它的生产越大。禁止排放污水会减少产量。不然企业用不着排放污水。绝对禁止一个企业排放污水可能使它无法生产。问题是应当容许企业排放多少污水。我的观点如下。

为了保护环境，广东省政府环保局应先设定一个保持河水清洁的容许排放量，这一数量日后可以更改。排放量不是以污水的重量而是以排放污染物的数量计算。为了执行企业排放的总量不多于这一总数量的政策，环保局可以发放同量的许可证。规定企业需要用许可证才能排放等量的污水。想要拿到许可证，企业必须向环保局购买。购买的价格先由环保局决定，再由每个企业决定买多少。如果定价太低，企业的总需求会多于许可证的发放量，环保局便提高价格，直至供求相等。同样，如果定价太高，企业的总需求会少于许可证的发放量，环保局便降低价格，直至供求相等。利用许可证的优点在于等量的污水排放给每个企业带来相同的产量增加的好处。如果不均等，那些从排污许可中受益较少的企业，可以把一些许可证转让给从排污许可中受益较多的企业，总产量便会增加。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一种资源（清水）用于不同的生产，应有同样的效益，才能使许多企业的总生产达到最高的产量。

上述论点，假定许可证的数量是已知的。如果环保局认为发放的排污许可证还是太多，可以少发许可证；认为增加一些污水不致影响河水的质量，可以多发许可证。了解以上用来控制污水排放的方法以后，下面我要介绍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决定由谁发放许可证，应当发放多少。

清水是人们拥有的一种资源，利用它的企业应当付出代价。企业用了东江的水，污染了它，就应当为东江下游居民容许它们使用江水支付费用。排放的数量和排放的费用应由东江下游供给资源的民众和需求资源的企业共同决定。两者的供求便决定了应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和价格，这与用供求来决定一般货品生产的数量和价格一样。在决定供给许可证的时候，广东省

政府应当征求东江下游居民或居民代表的意见，然后发放一定数量的许可证。供给数量决定以后，企业对许可证的需求，便会决定许可证的价格。如果居民或他们的代表认为污水还是太多，宁愿减少出售许可证的收益，便会少发许可证。这样便回答了上面的问题：谁来发放许可证和应当发放多少。照理是应当让受害的居民来发。为了方便，我们让环保局征求人民代表的意见后发放。同样的方法可用来控制空气污染的问题。原则上，受害的当地居民请当地政府代他们发放空气污染的许可证并把收入用来增进居民的福利。

如果实行上述政策，政府需要知道每个企业的污水排放量。政府可以派人调查，或让每个企业自行上报，政府可以调查上报的数量是否属实。如果少报，政府应给予严厉的处罚。这样便会使企业报告真实的数量。

上面的讨论是利用经济学原理来解决环保问题。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都可以应用，在富有或贫穷的地区也同样可以应用。我近期出版了一本著作《环保问题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本文是根据该书第二章的理论来分析东江污水排放的现象及控制污水排放的对策。环保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讨论，例如决定全球每年碳排放的适当数量，如何规定每个国家容许排放的数量。这些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解答。

什么是适当的货币政策

货币本来是天然的产物，如贝壳、金与银之类。它们的价值来自供应有限，物以稀为贵。后来政府开始印发钞票，这是人造货币，其价值也是基于供应有限。如果政府印发太多货币，货币的价值便会降低，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增加不但影响物价还会影响生产，因为物价的变动慢于货币增加的变动。货币增加了，商店不可能马上提高物价。当货币增加了10%而物价不会同时增加10%，拥有货币的民众即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导致生产增加。总之，改变货币增加的速度会影响物价与生产，因为就业受到生产的影响，货币供应也影响了就业和失业的数量。但是如果持续增加货币供应，只会导致通货膨胀，不然政府可以通过印发钞票来促进经济发展。

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增加货币的速度影响物价与就业。对于什么是适当的货币政策，经济学界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可以分为两类：用规则（rule）或相机抉择（discretion）来决定货币增加的速度。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用规则，建议中央银行把货币增加的速度维持不变。他认为货币供应对物价与就业的短期影响无法预测，中央银行既然无法控制物价与就业的短期波动，不如维持固定的货币增加速度，以稳定物价与就业的变动。建议用相机抉择的也有不同的主张。大致是建议根据近期的物价与失业数据来决定。如果失业率过高，则多增加货币供应。如果通胀严重，则减少货币供应。但还有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如利用各种数据预测未来通胀与失业的数量。不同的中央银行行长会用不同的数据，即使用了同样的数据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并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这便是他和他下属的研究机构用相机抉择来决定货币政策。本文讨论适当的货币政策，只谈制定政策的原则，不谈如何利用计量经济方法与通胀和失业等数据来决定货币供应在某时的适当数量。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三次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用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抛出货币买进大量政府公债，提高货币的供应和公债价格，把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美联储希望以此来促使银行多发放贷款，增加企业的生产与投资，但是效果不明显。其原因是企业预期产品将来的需求不大，不愿多生产与投资，无论利率如何低，它们还是保持自己的策略。事后经济学家与社会舆论对2008年后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信心。其实，在常规的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是有效的。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并非正常情形，而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整个经济的借贷活动不能正常进行，这是货币政策无法挽救的。

现在继续讨论在常规经济波动的时候应当使用哪种货币政策。今天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应当用相机抉择的方式来决定适当的货币政策。但有一种不同

意见，就是用相机抉择的方式决定了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后，应否向社会公布以及应当公布多少。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刚上任时，宣布今后将会尽量向社会公布美联储决定的货币政策，目的是帮助企业与消费者能利用这些信息来筹划他们的经济活动。虽然这是一个好理由，但是应当把政策透露多少并不容易决定。如果公布太多，美联储难以更改政策。而美联储应当如何公布它的货币政策，至今还是一个在议论中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经济波动比美国小，主要问题不是如何避免或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放缓时，中国政府会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财政政策是利用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来控制经济生产的总需求，像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用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应用主要是控制通货膨胀，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中国通胀率过高影响社会稳定，正是因为货币供应增加太快，没有使用适当的货币政策。

再谈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受到影响，但是影响不算太大。受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GDP增速下降，从2010年到2013年GDP的增长率分别是10.4%、9.3%、7.7%与7.7%。这几年以商品零售价格计算的通胀率分别是3.10%、4.90%、1.99%与1.40%。为了增加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中国政府在2008年至2009年增加了约4万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支出来维持GDP的增长。从2008年到2013年人民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把存款利率从0.72%降至0.36%。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互相联系，分工合作。美联储则与行政部门独立，双方合作有赖于美联储决定货币政策时设法与财政政策配合。

本文的目的是回顾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解释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并说明人民银行施行的货币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通货膨胀。从1984年到1989年，零售价格指数从1.177增至2.034，原因是货币供应在这几年增加了太多。从1984年到1989年，流通中货币M0从482亿元增至2099亿元。从1993年到1994年通胀再次发生，零售价格指数从2.549增至3.102，流通中货币M0从4746亿元增至5729亿元。通胀的原因也是货币供应增加得太多。当这两次通胀发生时，人民银行没有施行适当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的发生与人民银行能否施行适当的货币政策有关。在1995年以前，中国可以说是没有货币政策的。1984年人民银行让货币在一年内增加了50%。当时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给予企业部分自主权，同时也给予银行部分自主权。因为增加贷款能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引发银行大量贷款， 增加了货币供应，致使通货膨胀的发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鼓励继续改革开放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不久以后各省银行大量放款，1993年通货膨胀便发生了。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利用行政手段和相关改革措施在1996年以后禁止各省人民银行大量放款，行长如不执行便会被免职。结果通货膨胀放缓。到1998年中国的物价指数下降了。总之，这两次通胀（1985年8.8%、1988年18.5%、1993年13.2%和1994年21.7%）都归因于货币供应每年增加了约30%。

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人民银行法》，指定与授权人民银行用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和在必要时协助增加生产。货币政策包括决定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央行的基准利率和由它决定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被用来影响货币供应。从此人民银行有权力与责任来施行货币政策。1997年以后，虽

然中国的GDP继续增加，但通货膨胀问题并不明显。

目前中国GDP增长缓慢。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尽量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自2014年11月22日起人民银行降低了金融机构贷款和存款的基准利率，存款利率从3%降至2.75%，贷款利率从6%降至5.6%。

今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赖于人民银行制度的继续完善，如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存款利率由市场借贷的供求来决定。当实行货币政策时，人民银行的领导与干部需具备足够的知识与才能，在必要时能利用经济数据了解当前经济情况来决定适当的货币政策。中外无不如是。

中国复兴后的对外政策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公布了中国2014年的GDP为17.6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这说明今天中国比美国富有，有足够的资本向国外投资。2015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以“中国对世界的野心，发放附加条件的贷款”为题，报道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例子。本文先简单介绍这一例子，再讨论中国的对外政策。

《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对外投资的例子是中国在厄瓜多尔建设多种项目，包括在乡村和城镇修建公路、桥梁、医院。约有1000名中国工程师和工人正在建设一条水坝与15英里长的地下隧道，价值22亿美元，用以运转8个巨型涡轮机发电所需的河水，电厂发出的电，足以照亮厄瓜多尔1/3的地区。

在太平洋上的曼塔（Manta）港附近，数家中国的银行正在谈判，以提供70亿美元的贷款来建设一家炼油厂，产量足以使厄瓜多尔变为汽油、柴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主要供应国。在厄瓜多尔的投资只是中国在全球各地投资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中国在非洲、南美洲甚至美国都有大量的投资。

中国的资产外流，包括物资、人力与技术转移，类似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的情形。引进外资的国家因此受惠。现在中国的资本流向国外，增加当地的资本。资本增加后当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便会增加，就可以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的资本外流也受到一些批评，认为中国试图称霸世界。

第一种批评可能来自受益的国家。中国的劳工到别国工作，可能会歧视当地居民，认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没有中国人高。因为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的人民，多半是贫穷且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而且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也和中国人不同。当中国经济还未发展时，欧美的强国在中国活动，欧美人士也觉得中国的文化不如他们，也歧视中国人。这使中国人很愤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今天中国对外投资，接受投资国家的居民，也可能会对在其领土上工作的中国人，有同样的反感。

第二种批评可能来自美国。数十年来，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中国复兴与经济发展以后，有能力与美国抗衡，美国认为中国是它的竞争对手。其实美国这种看法也有它的道理。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从前需要美国的资助，现在得到中国的资助，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这使美国敌视中国，希望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不要再提高。在经济

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反对中国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其实这家开发银行，像从前由美国推动建立的世界银行一样，让富国供给资本以资助穷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已有多个国家参加。建立一所这样的银行对世界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目的和美国从前推动建立的世界银行一样。但是美国对此极力反对，因为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不希望由中国推动的项目能成功，甚至反对中国发起建立这样一所对世界有利的开发银行。

还有中美之间的军事对立。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增强了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活动包括在世界各地驻军，数十年来和多国战争，包括韩国、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现在中美的军事对立发生于中国沿海的岛屿和利用海上物资的权利。

数千年来中国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强国。后来西方科技进步，从鸦片战争开始用武力侵略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现在中国复兴了，中国的资本外流，可以帮助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对这些国家是有利的。但是这也引起受益国家和美国的反感。我们应当正确认识这种反感，设法调整我们的政策以促进中国与受益国家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及世界的和平。

比较当今中美的货币与金融政策

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发生后，美联储开始施行货币政策，旨在帮助经济复苏。政策的一方面是降低利率，以增加企业向银行的贷款，以此增加投资。另一方面是买进政府债券，以增加货币供应来提振消费和投资的总需求。这样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数年内实行了三次，但是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到2015年9月，经济复苏的现象才开始明显，失业率已从12%降到2015年5月的5.5%，GDP增长率从负数已回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3.3%。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开会8次。近几次开会以前，一些企业界和经济学界人士预测美联储会提高利率。但2015年9月17日的一次会议后利率依然没有提高。经济学界人士正在争论美联储是否应提高利率。经济学家对政策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提高利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

提高利率的弊端是可能使经济复苏的速度降低，甚至使之停止。好处是紧缩货币的政策能避免通货膨胀。但是现在美国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衡量利弊的结论是提高利率弊多利少。有些经济学家反辩说增加货币供应对物价的影响是缓慢的。假定今天没有通胀，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要等到一两年以后通胀才会发生。数年来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行了三次，已存在通胀的潜在可能。虽然通胀还没有出现，但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应，以后通胀便极有可能发生。

上面说明目前美联储应否提高利率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近，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美联储的政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值得我们参考。评论内容包括美联储的三个重要职责：降低过高的失业率、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和稳定金融市场。

1.目前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那么快。报道中提到的失业率只有5.5%,但其中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高于9%。如果把非全职就业的人算为失业的人，失业率高至10.3%。2016年基层工人的实质工资下降了0.5%。

2.关于美联储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到2015年7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2%，远低于美联储议定的2.0%的目标。如果现在放松货币政策，绝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另一点是如果容许适当的通胀率，让经济复苏更快一些，会使工资增加，减少人民收入的不均。

3.美联储的另一重要职责是通过稳定金融市场来减少经济波动。不但要禁止金融资源流向投机活动，还要鼓励金融资源流向对美国经济有利的投资活动，使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能扩充设备，增加生产。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要维持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数次降低利率，减少银行贷款需要的准备金。从货币政策的三个指标来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失业率不高，近年来约在5%左右。但是中国施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理由不是失业率的高低而是GDP增长的速度太慢。第二个指标是控制通胀。现今中国的通胀率不高，也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比美国晚几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应当继续。

但是，中国政府施行的货币与金融政策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在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中国的金融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银行发放的资金大部分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使一些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得不到充足的资金。第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否适当。美国的金融市场已建立多年，监管仍有错误，以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中国建立金融市场较晚，监管也常会发生错误，例如对股票市场多次干预。适当的政策是让投资者自由买卖股票，不然当股票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时，人民会质疑政府的政策。

反腐与经济体制改革

清除腐败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今天中国政府施行的两个最重要的政策。本文讨论这两个政策的密切关系和怎样有效地同时施行。

中国的腐败现象不但是国内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世界新闻关注的一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反腐的政策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施行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同时，李克强总理强调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本文先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腐败，再提出一些建议来减少腐败。这些建议同时也适应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腐败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习近平主席用行政手段处罚腐败官员是被民众拥护的。清除腐败有两种办法：一是严重处罚腐败分子，降低腐败的利益。二是消除腐败的机会。腐败必须有腐败的机会，从腐败中得到好处。消除腐败的机会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腐败的人必须有机会从他的职务中获利。有两种职务可带来经济利益：第一是有权力批准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包括创办民营企业、经营民营企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如领取进出口许可证；个人需要政府批准的各种活动，如领取各种证书。第二是有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管理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领导拥有权力，可以用来分配经济资源，借此把国有资源据为己有。用第一种权力谋取利益是腐败，用第二种权力谋取公有资源也是腐败。要清除腐败，便要消除上面所说的两种权力。

因此，要取消的权力包括：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减小国有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第一点是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力；第二点是允许建立更多的民营企业和银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把企业的财富据为己有便是腐败。一个民营企业的业主或管理人员拿企业的资源不是腐败。民营企业主当然有权获得企业的财富。如果企业的经理不合法地获取企业的资源，是犯法行为，但不是腐败。他不是政府的官员或国有企业的管理人，他的违法行为由企业的业主根据法律处理。

上面说的取消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和减少国有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正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让政府参与大量的经济活动，如控制大多数的企业，让国有企业的生产占全国总生产的很大比重，正如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缩小国有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民营企业的活动范围。这也是清除腐败的一个办法。

借鉴美国的大学教育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几位中国大学的校长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们想知道如何办一所一流大学。事实上用行政手段不能把一所普通的大学变为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是教授的质量。没有一流的教授便不能办一所一流的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学变为世界第一，原因是战时欧洲的很多著名学者逃亡美国，包括从德国逃亡的犹太学者。战后美国经济进步，生活环境良好，又吸收了世界学术的精英，同时还有优越的环境做研究以提高学术水平。

中国的大学在历史上受到几次挫折。1952年政府把所有的私立大学关闭，一流的私立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都被解散。随后政府改变了大学制度，将综合型大学改变为专业院校来满足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文革”时期大学基本停课，直到1978年以后才慢慢恢复。与上述美国大学的历史相比较，中国大学可谓历经坎坷。

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如美国的大学，不但有历史的因素，还有制度的因素。美国最好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的，像民营企业，有自主权，经费不靠政府，而是靠收取学费与校友捐助。像民营企业的董事会，私立大学由董事会来委任校长和监督学校的工作。私立大学的政策，如课程设置、每科教授的人数和学生的人数等都是由校方自己决定。虽然一般私立大学的目标不是赢利，与民营企业不同（有少数私立大学的目的是赢利），但它的产品是教育，它的目的也是希望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好的大学会尽量招聘优秀的教授来提高教育水平，培养优秀的学生，正如民营企业尽量制造优质的产品。美国政府几乎不干预民营企业和私立大学的运作，让它们自由竞争。因为只有优秀的教授才能提供良好的教育，校方会尽量设法聘请优秀的教授来保证教育产品的质量。

与美国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由教育部管理，像国有企业由政府管理，攻读某科目学生的人数需要教育部批准，学科的内容也需要教育部批准，大学无法自由选择科目来适应社会的需要。如果全国大学的学生人数由政府决定，而不是让各大学分别观测市场的需要，就会产生问题。例如大学快速扩招，各学科发展很快，教育部和大学都难以聘请足够的教员来制定课程和改进课程，降低了教学水平。大学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影响就业。总之，不让各大学自由决定供应大学教育所需的各种要素，如教授、教材和学校规模等，便会降低大学教育的质量。

在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中国的大学教育呢？我们

可以从三方面考虑，即师资、学生与学校。关于现有师资的质量，教育部已经设法改进，如制定千人计划，把在国外的著名中国学者聘请回国，还用各种办法鼓励在国内的教授。但更重要的是为国内教授或从国外聘请的教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国大学教授的工作环境有不少缺点，如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都需要教育部批准。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并不太难，只要给他们更多自由去干自己想干的工作。

关于学生的质量，如果不提高中国大学的质量，中国优秀的学生都到国外去留学，降低了国内大学生的水平。学生的质量有赖于教师的质量，提高教师的质量，便会同时提高学生的质量。

改进中国大学教育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在适当的环境下容许创办更多的私立大学。早在1980年初期中国已容许创办私立小学，结果，优秀的小学很快建立起来。如果容许和鼓励创办私立中小学，为什么不容许创办私立大学呢？政府已批准建立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等私立或合作办学的商学院，再进一步可以逐步创办少数私立大学。如果这些私立大学的运作不影响中国的教育政策，而且教育水平良好，教育部可以逐步放宽私立大学的准入条件。正如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用实验方法改进企业的运作一样，这样的改革一方面节省教育部的费用，另一方面让私立大学有机会创新。良好的私立大学还可以作为公立大学的榜样。